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出版社

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8 号

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王宗维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武威市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5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第 1 次印刷
字数：97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0671—6/K・75 定价：3.30 元

前　言

回回民族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它是在将近一千年左右的时间由于伊斯兰教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各地，传教的穆斯林和我国各族人民相互融合，至明代中后期才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一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就不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并做出了自己贡献。

我国西北地区的是回回重要聚居区，总人数超过其他地区，陕甘宁尤甚。研究西北回族的来源和形成问题，是研究回族历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资料基础之上，而且还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本世纪30年代，当中国回族史回回形成问题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时，《多桑蒙古史》汉译本问世，而且作为大学参考丛书之一推荐给人们。该书引用了波斯学者拉施特《史集》中的几段荒诞不实之辞，把西北回民的来源归之于元代安西王阿难答“笃信”伊斯兰教，从而使他属下的十五万军队也信了伊斯兰教，后发展为西北地区的回民。这里明显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阿难答是忽必烈的孙子。当时忽必烈热衷崇信藏传佛教，他的孙子有无可能对抗皇族规矩皈依伊斯兰教；第二，阿难答本人是否拥有十五万军队；第三，他是否仍然像他的父亲一样兼辖陕、甘、宁、青、四川、西藏和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统治整个西北、西南。

但是在这几个重要问题尚未弄清楚以前，有的学者就把拉施特的说法作为依据，在著作和论文中加以引用和阐发，试图解释西北回民的来源，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目前见于著作和论文的不下百处。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这样权威性著作中，也承袭了这种说法。如《伊斯兰教》条中写道：

> 元世祖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其所率士卒多数为穆斯林，从而使其辖区（陕、甘、宁、青等地）伊斯兰教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阿难答》条记：

> 自幼信奉伊斯兰教，通晓《古兰经》及伊斯兰教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承袭其父忙哥剌（忽必烈第三子）的安西王爵位，并称秦王，统辖陕西、四川、甘肃、宁夏等地。设王府于京兆（今陕西西安）和开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开城乡），冬居京兆，夏徙开城。他袭封安西王的28年间，在其辖地传播伊斯兰教，颇有建树。《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五章云："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15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

《多桑》抄自《史集》，实为孤证。当时流行的汉文、蒙古文和西夏文均无类似记载，而且历元、明、清三代也无人追记其事，这不是史家忽略，而是根本就无其事。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元世祖忽必烈设立安西王的历史背景、设置经过、安西王三任世袭期间的性质、作用、权限及其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情况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窝阔台汗执政时期，陕甘宁青和新疆的部分地区，是其子阔端王统辖；后来拖雷系的蒙哥汗、忽必烈汗当政，忽必烈先以亲王领有秦地，后来也是利用经营陕西的基础夺取了汗位。至元五年，他命其第三子忙哥剌以亲王出镇陕西，控制西北。九年，立真金为太子前，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后加封秦王，统辖西北西南地区。分封的目的，除原来控制西北地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西北、西南加强灭宋的力量。这一战略目标最后实现了，安西王和安西王相府从汉水流域、西蜀四川对南宋的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南宋灭亡之际，忙哥剌逝世。忽必烈此时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同时也对忙哥剌的儿子阿难答年幼不能当大任，而其母野心勃勃，急于当权，很不放心，迟迟不下诏命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与此同时，罢王相府，加强行省建设，遣散军队，把原来安西王的权力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以防隐患。而王妃和阿难答则消极对抗，蓄集力量，但因大势已去，忽必烈又活了十五年之久，恢复原来王权的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把忙哥剌时期的权力、兵力、辖区放在阿难答身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忽必烈死后，孛儿只斤帖木尔即位，是为元成宗。成宗在位十一年，阿难答的处境江河日下，生活经常发生困难，不断要求救济。成宗死，阿难答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夺权，失败被杀，安西王府冷落。数年后，其子月鲁铁木儿继承王位，更是徒有其名而已。月鲁铁木儿经常与畏兀僧勾结，阴谋谋反，最后被处死。安西王历三任，各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权力相差极大，不能张冠李戴，李戴桃僵。

从阔端王在位时，蒙古高级贵族为了政治需要，就同藏

传佛教建立起密切联系。忽必烈即汗位后，尊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并把该教带入宫廷，终元之世，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强。阿难答成长，是在忽必烈在位时代，忽必烈岂能容忍与自己政治目的不同的孙子任意活动。从种种事实证明，阿难答和他的儿子不信伊斯兰教，后者是佛教徒，他是想依靠佛教恢复其祖先势力的。

西北回回有他们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当时随成吉斯汗、窝阔台先后东来的西域色目人中的穆斯林，不少落户到西北各地。他们与其他民族杂居、错居、婚姻，在文化上逐渐接受汉文化语言的同时，而宗教信仰不仅继续坚持，而且不断传播，扩大信徒。经历数百年之久，至明代中后期，才形成西北地区的回回民族。明《万历武功录》立《回夷列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北回回的状况，同时也是西北回回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标志。

历史科学，最重事实。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总是靠不住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书对安西王设置的背景和全部过程进行了考察，对元史中的这个问题作了系统交待。

目录

前言
一、从阔端到安西王…… (1)
二、安西王的设置 …… (13)
三、安西王的辖区 …… (28)
四、安西王的宫邸建筑 …… (43)
五、安西王的官属 …… (57)
六、安西王的军队 …… (70)
七、安西王府的经济收入 …… (85)
八、安西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 (98)
九、安西王属下的穆斯林…… (117)
后记…… (132)

一、从阔端王到安西王

成吉斯汗自统一大漠南北，建立大蒙古国，登上汗位时起（公元1206年），就注意对中原西北地区的占领。当时，统治西北地区的主要是西夏王朝，其次是金；北宋王朝自南迁后，史称南宋，其势力仅仅拥有陕南汉水流域的一部分地区。西夏的疆域西起河西走廊的瓜、沙二州，东达秦陇高原与金为邻，南至兰州至延安一线与金不时进行争夺，北控大漠，接大蒙古汗国。金在西北地区占有京兆、鄜延、庆原、凤翔、临洮五路，自然条件比西夏王朝占领区优越。加之，西夏屏障着金五路西北，隔绝蒙古，蒙古军队对金京兆等五路的威胁，相对要缓和得多。

成吉斯汗即位的前一年，蒙古军第一次向西夏的边塞进攻，掠夺了大批人口、牲畜和财产，但并未引起西夏统治者的警惕。接着又于1207年，1209年，1216年，1217年四次进攻西夏，军队由边境地区逐渐向内部深入，直逼京城中兴府（兴庆府），迫使西夏主襄宗称臣纳贡，蒙古军得到大量战利品。西夏统治者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能与邻邦金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共抗蒙古入侵，反而在1216年蒙古军经西夏所占的陕北地区进攻金鄜延路时，西夏乘机出兵配合蒙古，攻下潼关，夏金关系彻底决裂。次年，蒙古军进攻中兴府，夏主神宗遵顼逃往凉州。只是因成吉斯汗将出兵远征中亚，暂时把主力军队撤离，留大将木华黎继续攻金，兼掠西

夏，西夏政权得以继续维持。

成吉斯汗二十年（1225），蒙古军征服中亚的第一次战争结束，陆续东返。次年正月，成吉斯汗“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亦剌合·桑昆）及不遣质子”为由，从西面向西夏占领的河西地区进攻，依次占领了黑水城（哈剌浩特）、甘州、肃州、凉州、至靖边以北的黄河九渡，①。对西夏京城中兴府形成威逼之势。西夏各城军民虽然对蒙古军进行了英勇抵抗，肃州城使蒙古军久攻不下，成吉斯汗下令“尽屠之”②。西夏河西走廊地区的失守，不仅失去了半壁江山，而且无数人民死于战火。

二十二年（1227），成吉斯汗军继续围攻西夏都城，自率师攻积石、临洮、河州、西宁，这些地方进入蒙古版图。闰五月，登扼秦陇蜀咽喉之战略要地六盘山避署。七月，成吉斯汗在灭亡西夏的前夕，死于萨里川，遗命秘不发丧。待西夏主投降后，才将死讯传开。

早在成吉斯汗西征前，他已经考虑大汗的继承人问题。由于诸子争夺，遂指定“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③的三子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当时由于窝阔台在霍博之地，命四子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元年（1229）八月，拖雷召集东西道诸王大臣会于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成吉斯汗大斡耳朵）商议推举大汗，窝阔台以遗诏即汗位。

窝阔台汗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遵照遗诏灭金，而灭金必须首先巩固后方，特别是新统一的西夏地区。当时诸路军

① 《元史》卷一《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同。
② 《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
③ 《元史》卷二《太宗纪》。

会集凉、陇，成吉斯汗西征返回时从中亚等地带来的大批诸色目兵士、各色工匠也多驻屯于此，西夏统治集团中残余的复辟势力仍然存在。为了坚守这个战略要地，窝阔台汗将自己的三子阔端安置在凉州（甘肃武威），称阔端王。为了加强阔端王的军事力量，"从也可那颜诸子管辖下的军队中将亦鲁该那颜的兄弟异密都剌带宝儿赤及雪你惕部异密连同一千雪你惕部军队及二千速勒都思部人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①]在安置后方基地的同时，遂向关中地区扩张，二年（1230）三年（1231），接连攻占凤翔、宝鸡、韩城、蒲城、京兆等城，占领关中，并命拖雷等从宝鸡出发，经汉水流域东下，攻金河南等地。蒙古大军陆续向东推进，留皇子阔端"镇西土"[②]。此"西土"从河西瓜沙二州直至陕西全境，尽属于皇太子阔端王的统治之下。从陕西户县草堂寺所存阔端太子令旨碑和重阳万寿宫所存的碑文反映，阔端王对关中地区的军民事宜实行有效管辖[③]。

阔端镇西土期间，还做了两件大事，对以后具有重大影响：一是招降金巩昌守将、便宜都总帅汪世显，二是邀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及八思巴等来凉州会谈，讨论蒙古军统一西藏的问题。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显传》：

>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镇人，……系出汪古部族，遂氏汪。……（金）正大六年（1229），金廷以巩州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等译第380—38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 《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此"镇西土"三字不包括天山南北，下文概念同此。
③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

地当冲要，升为巩昌府，以完颜仲德为府总帅，世显改兼治中。……八年（1231）仲德以便宜总帅进行省事，集临洮、庆阳二十四城将士吏民数万保据西和州（甘肃省西和）石门山，依险为治。……天兴元年（1232），蒙兀大举伐汴，仲德将三千人入援，以留事，付世显。及仲德勤王师溃，世显遂代为便宜都总帅。……蒙兀斡哥歹汗之八年（1236）十月①，皇子阔端徇地至西和，遣人招降。世显集诸将议曰："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顾十万人命悬于吾手。"……乃帅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币迎谒军门。阔端诘之曰："吾国军所至，无敢抗颜行者，尔来何后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卖国耳。"阔端曰："金亡已久，尔主安在。"曰："大军迭集，莫知适从，惟殿下神武不杀，故敢以圉城军民、讬命。"阔端大悦，饬其下秋毫毋犯。比世显诘旦诣行帐，即承制锡以章服，仍其故官，从以南征，断嘉陵江路。明年秋，捣大安东。

参照《元史》卷一五五《汪世显传》，阔端招降汪世显部，也是以"仁武不杀"取得汪世显的信任，才尽得其众的。

阔端王招降汪世显，不仅统一了临洮、庆阳等二十四城的土地，获得了十万将士吏民，彻底消灭了金朝在西北地区的势力，使"西土"连为一片；而且更重要地是占领西和后，蒙古军可以顺西汉水而下，经石门（陕西略阳西北）、大安（陕西阳平关北），至四川之利州（广元）、绵州（绵阳），直达成都，打开了进军四川，从西侧夹击南宋的大门，汪世显所部也成了蒙古军进攻四川的先锋和后备力量。窝阔台汗八

① 此八年十月，据《元史·太宗纪》为七年十一月。

年（1236）十月，阔端入成都。十三年（1241），宋四川守将陈隆之声言有众百万，向蒙军挑战。阔端招世显等诸将议，遂令进薄其城，擒获陈隆之。“阔端嘉其功”。乃马真后二年（1243）“阔端召世显赴行营，承乃蛮真可敦制，赐虎符、锦衣、玉带，真拜便宜都总帅，手教命秦巩定西金兰洮会环隆庆阳平凉顺德镇戎原阶成岷叠西资等二十四城，并听节制。”①“承制以（临洮吐蕃人）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时兵兴，城无居人，至则招逃亡立城垒，课耕桑以安辑之。”② 叠州即今甘肃迭部县，属松潘。阿哥昌父子随汪世显部降阔端，子阿哥潘随大军入蜀，昌任叠州安抚使，不仅从侧翼保卫了蒙古入川军，而且为向吐蕃地区发展建立了要塞。

其次，叙述阔端与萨迦派大师萨班及八思巴的关系。

成吉斯汗西征回军途中，就曾有统一吐蕃的动机。窝阔台即位后，将三子阔端安置于凉州，“以镇西土”。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阔端王在四川的军事进攻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返回凉州，派部将多达那波进入藏区，想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代表藏区与阔端王商议吐蕃归顺蒙古大汗的事宜。多达那波经过广泛、深入的了解，在给阔端王《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称：“在边野的藏区，僧加团体的甘丹派（噶当派）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噶举派）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止贡噶举派的京俄）为尊；通晓佛法以萨迦·班抵达（萨迦派首领）为精。”③ 请求阔端决定，迎谁为宜。

---

① 《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显传》。
② 《元史》卷一二二《赵阿哥潘传》。
③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第88—89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

当时正值窝阔台汗病重，阔端立即命多达那波回师，自己前往和林。

乃马真后三年（1244），阔端又派多达那波带着他的书信去请萨迦·班抵达。信中说："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①当时萨迦班抵达已六十三岁，为了赴约，除自己要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外，先派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经拉萨前往凉州，于次年到达，而他自己于第三年（1246）八月才到凉州。这时正巧阔端王在和林参加推举大汗的会议。至贵由汗即位后，于1247年初才回到凉州，与萨班开始会谈。

这次会谈，双方是诚实、坦率、愉快的。萨班向阔端王介绍了许多佛教教法，阔端十分高兴。会谈结果，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可以反映其梗概。兹摘录如下：

> 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召余前来之大施主极为欣然曰："八思巴兄弟如此年幼，能偕从人一道插来，吾已深思矣。尔系以首归附，他人咸系以足降顺者；尔为吾所召来，他人则系惊惧而来，此情吾岂不知乎！……尔若护以圣教，则释迦牟尼之教岂有不遍弘海内者。……
>
> 要言之，此霍尔之军旅无算，窃以为瞻部洲已悉入其辖土矣。顺彼者与彼共苦乐，心怀厌恶不遵功令而空言归顺则不许，且终有因而覆灭者。……
>
> 又谓："若能遵行功令，则尔等之地，各处部众原有之官员仍然加委供职，召萨迦之金字、银字使者来，吾

①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第80—8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任之为达鲁花赤极为妥当。此事可广事宣谕，应派干练之使者从事之。另将各地官员姓名、部众数字、贡物之量缮写三份，一送吾处，一方萨迦，一由各地长官执掌。并书志某已降，某未降。若未分别，则恐于未降者之祸殃及已降者。萨加金字使与各地官员善为商榷，利乐众生有情，勿擅作威福；各地长官亦毋不与萨迦金字使议而擅权自主。……”

汗于余关切愈常，故全国、蕃、畏吾尔、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各地人士均目为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吾等来此之人，勿劳操心霍尔将如何对待，均甚为关切，待之甚厚，余之安全其放心，勿劳关注可也。①

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通过双方和谐、亲密的会谈，确定了蒙、蕃关系的重要原则：西藏地区从此开始统一于蒙古大汗，西藏僧俗官员都要经过大蒙古国的任命或认可，各部各教派属民要向蒙古汗国履行纳税当差的义务。换句话说，西藏从此开始就逐渐成为蒙古汗国—元朝的一个部分。

贵由汗三年（1248），大蒙古汗庭发生了拖雷系和窝阔台系子孙们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在拔都的支持下，拖雷的儿子蒙哥击败窝阔台系的子孙们，于1251年即了汗位。与此同时，阔端病死于凉州，萨迦班智达也相继去世。阔端的王位由其三子只必贴木儿继承。

在拖雷系同窝阔台系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他们的儿子蒙哥和阔端之间并没有对立起来，至少矛盾还没有公开化。据

① 此书王尧先生从藏文译出，兹引自王辅仁先生《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30页注⑱。上引《萨迦世系史》第91—94页所引，与此略有差别。

说，“阔端和拖雷汗诸子十分友好。当窝阔台的兀鲁黑同蒙哥合罕发生内讧时，阔端没有背叛蒙哥合罕，因此，当蒙哥合罕将他们的军队分掉时，如前所述，隶属于阔端的那些［军队］仍归他管辖。［后来］忽必烈也继续把军队交给他们的儿子们管辖。”① 不管怎样，蒙哥汗对西藏的政策，仍按着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谈判的成果发展，蒙古汗对西藏的管辖逐步加强。

阔端王从成吉斯汗和窝阔台汗手里获得了“西土”这一大片领地，又通过自己努力，先招降金将汪世显，不仅得到了秦巩等二十四城，还打开通往四川的大门，把军队伸入四川，占领了川西平原。接着又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通过谈判，辅平了统一吐蕃各部的大路。他近二十年的努力，实际上为后来安西王封地奠定了基础。

拖雷的长子蒙哥取得了政权后，对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原有的辖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削弱其势力，使其对大汗位不至构成威胁，仅对当时在汗位斗争中同情过蒙哥的阔端第三子只必贴木儿，使其继承阔端王位，史称只必贴木儿王；次子蒙哥都，使“分其父阔端西凉府迤西之地，命侍其祖母乞儿吉思忽贴尼可敦（窝阔台汗妻）居之。”②，阔端的其余辖地尽归蒙哥汗统治。

蒙哥汗驻守和林，以其三弟“最长且贤”，“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③，“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忽必烈）

①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等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81页。
② 《蒙兀儿史记》卷三七《阔端太子传》；《元史》卷三《宪宗纪》。
③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总之”[1]。但对其总不放心。接着，蒙哥大封同姓，“敕世祖于南京（南京路，治开封）、关中自择其一”。姚枢以为：“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潟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上愿有关中。”蒙哥又说：“是地户寡，河南怀孟地狭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内。”[2] 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以至尊且贵的亲王，“出王秦中”[3]，这是大蒙古国在关中封王的开始，仍称宗王，后史称“秦王”。

忽必烈受封后，即至京兆。当时，“京兆控制陇蜀，诸王（宗王）贵藩分布左右，民杀羌戎，尤号难治。”[4] 早在窝阔台汗时期，曾将河中、陕西诸路赐拖雷五子旭烈兀为分地，未赴[5]，其艰难可想而知。忽必烈面临重重困难，于蒙哥汗四年（1254）开始经营关中：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6]；“奏以廉希宪、商挺宣抚陕西，以（赵）良弼参议司事”[7]；“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种”[8]；“又思所以教化秦人，乃召（许）衡为京兆提学”[9]，兴办教育。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当时驻兵于京兆，争相筑第，攀比豪侈的蒙古贵族将领分遣于兴元（陕西汉中）诸州。“旬月之间，民大和洽，道不拾遗。”后，姚枢由六盘求居关中，“教使劝农，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10] 又办凤翔屯田，安

---

①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②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③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④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⑤ 柯绍忞《新元史》卷一〇八《拖雷传》。
⑥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⑦ 《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
⑧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⑨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⑩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置流民，增加收入。奏割河东解州（山西西南）盐池，募民漕运至关中、四川等地，不仅满足军民需要，而且获得巨额收入。数年间，“关陇大治”①，社会秩序日益稳定。

形势的发展，正如姚枢所料。忽必烈在得到分地以前，姚枢曾向他提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② 蒙哥汗七年（1257），活动于蒙哥汗身旁，留守和林宫阙、帑藏的贵族阿蓝答儿，见关中陇右地区，形势大好，“惮世祖（忽必烈）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③ 蒙哥汗听信谗言，于七年（1257）以阿蓝答儿为陕西右丞相，刘太平参知政事，来陕“钩校京兆钱谷”④，甚至“用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⑤，形势对忽必烈十分不利。在危急关头，姚枢劝忽必烈：“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⑥ 另外，对所钩校钱谷，民“贫不能输者，帝（忽必烈）为代偿之。”⑦。忽必烈接受了姚枢的劝告，立即带领王妃及王府财物北上朝见蒙哥，以示忠诚；蒙哥也设宴招待了忽必烈一行，兄弟握手言和。表面上矛盾似乎缓和下来，实际上蒙哥对忽必烈更不放心。次年，蒙哥汗亲自带兵伐宋，由东胜（内蒙古托克托）渡河经六盘山，拟由四川而下，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而进，以明安答儿为太傅守京兆，留辎重于六盘山⑧。而原忽必烈封地关中所置官史接连调出，命忽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③ 《元史》卷一五九《赵良弼传》。
④ 《元史》郑一五九《赵良弼传》。
⑤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⑥ 《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⑦ 《元史》卷四《世祖纪》。
⑧ 《元史》卷三《宪宗纪》。

必烈征鄂，藩邸名存实亡。

蒙哥汗九年（1259），蒙哥病死于四川钓鱼山（合州），亲王穆哥来忽必烈行营告丧，“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①]时廉希宪在鄂州军中，劝忽必烈：“愿速还京，正太位以安天下”；又说：“刘太平（时在兴元）、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在六盘……倘倚关中形胜，设有异谋，渐不可制。”[②] 接着，又得到察必可敦派密使送来的情报，汗弟阿里不哥在阿蓝答儿、孛鲁合等人的策划、支持下谋立汗位，且乘传调兵，大举南下。在严重的局势面前，忽必烈审度时势，即由牛头山出发，扬言军趋临安（浙江杭州），中途急转北上，向开平（上都，今多伦）进发，年底到达燕京。与此同时，派赵良弼至关中，探听形势。

中统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初分天下为十路，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五月，改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仍辖陕西四川等地。汪惟正（汪世显孙）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汪良臣领兵守沿河诸隘。时刘太平、霍鲁海、浑都海已应阿里不哥、阿蓝答儿反，浑都海等在六盘，派人密使其党羽密里火者于成都，乞台不花于青居（四川南充南），急派兵来援；闻廉希宪等将至，刘太平、霍鲁海“乘驿急入京兆，密谋为变”。廉希宪得知，“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刘）太平、霍鲁海及其党，获之，尽得其奸谋，悉置于狱。复遣刘黑马诛密里火者，总帅汪惟正诛乞台不花。”又命汪惟良（应为汪惟臣，见《校勘记》）将秦巩诸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蒙兀儿史记》作“末哥”。
②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军进六盘。汪惟臣以未奉上谕为辞，希宪即解所佩虎符银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办吾事，符制已飞奏矣！"又付银一万五千两，以充功赏。命绞刘太平于狱，人心遂安①。浑都海闻京兆叛军已败，汪惟臣大兵已向六盘开来，处境孤立，遂弃六盘辎重，率兵向西逃窜。廉希宪急命八春、合丹、汪惟臣等追讨。浑都海等至甘州（甘肃张掖），闻阿蓝答儿自和林提兵来会，合军而东，与汪良臣等对峙于山丹（甘肃山丹），历时二月。后会战于耀碑谷，良臣鼓动士卒，乘大风扬沙，直捣叛军，"获阿蓝答儿、浑都海杀之，西鄙辑宁。"② 阔端王子只必贴木儿王，在叛军攻入凉州时，遭到抢掠，仓库人畜丧失殆尽，诏命暂就食秦雍。

忽必烈原在关中封地为王时，招用了一批有才之士，沿用汉法，兴利除弊，使关陇大治，经济文化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阿蓝答儿等唆使阿里不哥对忽必烈进行压制、排挤，反对他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把忽必烈及其重用之人材调离关中，并企图以此为据点发动叛乱，夺取政权。忽必烈最后还是利用其旧部廉希宪，赵良弼、商挺等人，在关键时刻身先士卒，夺回秦陇，粉碎叛军的阴谋，使秦陇重新统一于忽必烈汗之下。忽必烈称汗后，对他旧日藩邸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清楚的，选择什么人镇守这一战略要地，是他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元代安西王的设置，就是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

①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② 《元史》卷一五五《汪良臣传》。

二、安西王的设置

忽必烈在集中精力平定西北叛乱军，节节取得胜利的时候，东部地区又发生了军阀李璮的叛变，并乘机占领济南。

李璮是李全的养子。红袄军起义失败后，李全为余众领导人之一，拥众降宋，藉机发展势力。成吉斯汗十六年（1221），蒙古军南下攻金，李全以为有机可乘，投降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李全在攻宋扬州的战役中失败而死，李璮袭位，并占有益都（治山东益都）行省。忽必烈即汗位初，加封江淮大都督。李璮得忽必烈重用后，谎报军情，骗取信任，而私自利用忽必烈“降诏奖谕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① 的职权，招降纳叛，纠集党徒，准备叛乱。中统三年（1262），李璮叛乱于山东，“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②

李璮作乱，事连中书平章王文统。王是璮之岳丈，曾为其婿提供军事情报，因此罪被杀。王文统之事又涉及到廉希宪。“平章赵璧素忌希宪勋名，因言之统由张易、希宪荐引，遂至大用。且关中形胜之地，希宪得民心，有商挺、赵良弼为之辅，此事宜关圣虑。”“蜀降人费正寅以私怨潜希宪因李璮反，亦修城治兵，潜畜异志。”③ 这些阴谋陷害之辞，立即

①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② 《元史》卷二〇六《李璮传》.
③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引起忽必烈的不安，并下诏命廉希宪回京城，以中书右丞南合代陕四四川行省事，并调离其属下，对汉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怀疑。商挺被调至四川，后入京师；赵良弼遭到“切责”，“至欲断其舌”① 的地步。至元元年（1264），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以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行省平章政事，彻底改换了旧班底，忽必烈想以此加强大汗对陕西四川等地的统治，但如何加强，还在筹划之中。

早在中统二年（1261）十二月，忽必烈曾封其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此为封王之始②。以后陆续封王，分驻边地，但对秦蜀地区一直犹豫徘徊，举棋不定。直至至元九年（1272），始以三子忙哥剌（忙安、忙阿剌、忙兀剌、莽噶拉）为安西王，出镇京兆。

关于忙哥剌始封时间和受封前的事迹，史书记载不详，且有许多疑点。过去未曾有人认真研究，兹略作为说明。《元史》卷七《世祖纪》记：

> （至元九年）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

卷一〇八《诸王表》：

> 安西王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镇长安。
>
> 秦王忙哥剌，至元十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

①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赵良弼传》。

② 见《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五又记：三年“十二月甲寅，封皇子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疑为衍文。卷一〇八《诸王表》亦记“真金，中统二年封”。《蒙兀儿史记》卷九《铁穆耳汗传》：“至元二年九月庚午，汗生于燕王邸。”知至元二年九月前，燕王已经有府第或官邸。同书卷七六《皇太子真金传》：“中统三年十二月甲寅，封燕王。”而卷一五〇《诸王表》注文又称：“三原误为二”，可能根据《元史》卷五《世祖纪》，该书已明记二年十二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诸王表》所记时间亦同，故从《元史·诸王表》所记。

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山）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

卷一五九《商挺传》。

九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为王相。

卷一六三《赵炳传》：

至元九年，帝念关中重地，风俗强悍，思得刚毅旧臣以临之，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

姚燧《牧庵集·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去皇子安西王有土关中之明年，当（至元）十一年，奏求公辅己，以故官（参知北京行中书省事）改安西王相。

姚燧《牧庵集》卷十《延厘寺碑》：

至元九年，诏立皇子为安西王，以渊龙所国国之。明年至长安，营于素沪之西。

根据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在至元九年十月，封地一为京兆路，一为六盘山开成（后设路），后者为安西王驻兵之所。次年，益封秦王，原因是皇子燕王真金得封皇太子后，为了摆平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加封秦王，赐金印，而且特允在长安、六盘“听为宫邸”，地位高于其他亲王。

然而，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中，引述了《元史》的几条资料后，特加注云：

据《本纪》、《诸王表》：金印螭纽。安西王忙哥剌封

年同。按真金为忙哥剌（同）母兄，以中统三（当为二—引者）年封燕王；那木罕为忙哥剌母弟，以至元三年封北平王；即忙哥剌之异母兄弟如忽哥赤，以至元四年封云南王；奥鲁赤以至元六年封西平王。而忙哥剌在真金、那木罕之间，且系忽必烈嫡子，顾其封安西王乃在那木罕之后，且在忽哥赤、奥鲁赤之后，殊不可解？窃疑忙哥剌之封安西王，本与那木罕封北平王同年，或且先之，至元九年始出镇京兆、六盘。《本纪》误以出镇之年为始封之年，世表又沿《本纪》之误耳。

屠寄所提的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他可以解决而未解决这个问题，应当说是一件憾事。最后所下的结论，又是那么唐突、武断，可见其不慎。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忙哥剌出任安西王前的经历略作追述。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至元元年八月条记：

其说书官，皇子忙安以孛榘为之，南木合以高道为之。

此“忙安”即忙哥剌，“南木合”即那木罕。当时真金已封为燕王，忙哥剌和那木罕还在培养过程中。忽必烈为了使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特聘儒学大师为说书官，以说书的方式指导其学习。当时他们都在宫廷。

《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至元）五年（1268），应诏建言：“凡有司奏请，宜先启皇太子，俾得闻习庶政，以为社稷生民之福。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帝是其言，敕中书施行。

这种大事，并非中书省所能决定，但中书者可奉诏提出方案。可见，至元五年已经开始酝酿陕西封王镇守的问题。

同上书卷一六七《张立道传》记：

> 至元四年……皇子忽哥赤封云南王，往镇其地，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有窃据之志，忌忽哥赤来为王，设宴置毒酒中，……立道闻之，趋入见……王闻其声，使人召立道，乃得入，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有旨召立道等入朝，问王薨时状。帝闻立道言，泣数行下，默然久之，曰："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

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驼钮金镀银印，在至元四年（1267）八月丁丑；九月庚戌，"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禿哥儿、金齿等处"①。至元五年（1268）九月，"复命云南王忽哥赤统兵南下"②，则忽哥赤被害和忽必烈诏见张立道，当在至元五年九月以后至六年初之间。忽必烈对张立道所说："事朕、事太子"、"事安西王"，此"安西王"或为史家追记，但指忙哥剌是没有问题的，朕、太子以下，依次排列，当为忙哥剌。此与五年议封皇子镇陕西之事正相衔接。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 （至元）七年，……燧年三十八，始为秦王府文学。……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辑膚、蜀。

此十二年之秦王，与七年之秦王，当为同一人，即忙哥剌。十

①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年忙哥剌正式受封为秦王，赐金印，七年所说之秦王，亦当为史家追记，但忙哥剌已封王，并开府，姚燧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忙哥剌是什么官职，开府于何处，我们从赵孟頫《福建廉访副使仇公神道碑》中可以提到答案。云：

> 至元八年（1271），公二十二年矣。安西王时以亲王镇京兆，喜优纳人士。公布衣入谒，王语合意，竟留给事邸中①

而《新元史》卷二〇八《仇谭传》记："父谔，字彦中，以布衣谒安西王。王善其占对，命给事左右，授武备院库使。"传中将"安西王时以亲王镇京兆"，径改称安西王，与上述《张立道传》、《姚燧传》行文情况相同。

由此可见，中统二年真金封燕王时，皇太子尚未确立。至元三年封那木罕为北平王，四年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六年封奥鲁赤为西平王，而真金之后的忙哥剌迟迟不得受封，而在《世祖本纪》等书中忙哥剌依次排列为第二，并未见有任何受贬之事。其不得受封的原因，正是忽必烈在考虑谁当立为太子，为汗位继承人的问题。直至刘好礼建言"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后，忽必烈仍未授忙哥剌以安西王出镇，而以亲王镇之。所以，对至元五年至九年十月前，忙哥剌以亲王镇京兆，开府期间，仍是皇太子的候选人。直至立真金为太子的大局已定，发布诏书前数月，先宣布封忙哥剌为安西王，使安其心；真金立为太子后，益加封忙哥剌为秦王，先赐螭纽金印，后赐兽纽金印，"一藩二印，两府并开"②，这是没有先例的。其中包含的奥密，大概只有忽必烈皇族中数人

① 苏天爵《元文类》卷六六，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知晓，别人是不清楚的。

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前，以亲王出镇京兆时，实际上已经活动于京兆、六盘山之间。《延厘寺碑》记："王未始至，岁维关中，夏则乐其高寒，即六盘居。"① 这就是说，忙哥剌当时活动于关中地区，夏季则居六盘山高寒地区避暑。因蒙古人不适应关中炎热的夏季，而六盘地区则非常凉爽。至元九年十月封忙哥剌为安西王，次年加封秦王，命于京兆、六盘皆听为宫邸，实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也有鼓励、安慰的作用。当然，忽必烈对京兆和六盘山的重要地位是清楚的，对忙哥剌仍是信任的。

忙哥剌受封以后，开始大兴土木，修筑宫邸。至元十五年七月辛亥，"改京兆府为安西府"②，与王号相应。以后，"在长安者曰安西路，在六盘者曰开成路"③，一王二府，直辖二路，是安西王的分地。

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忙哥剌病死，王位继承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安西王相商挺入朝奏事，"王妃使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训未习，卿姑行王相府事'。"④ 忽必烈拒绝了王妃想以其子阿难答继承王位的要求，王位暂空。次年，安西王相赵炳入朝。世祖问及关中及王相府情况，赵炳奏以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恣为不法"之事。忽必烈遂改封赵炳为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回安西王府，维持

① 姚燧《牧庵集》卷十《延厘寺碑》。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③ 《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新元史》卷一一四《忙哥剌传》。
④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相府局面，为将来阿难答继承王位创造条件。但是，赵炳刚刚回府，运使郭琮等知“窃弄威柄”事已经暴露，大祸将至，“则假嗣王旨，入炳罪，将炳（及其）妻孥囚之”，企图灭口。“时嗣王（阿难答）之六盘，徙炳等于平凉北崆峒山。囚闭甚严。”① 从郭假嗣王旨一语看，囚闭赵炳及其家属的事，阿难答当时似乎并不知道，或者未直接参与其事。当时阿难答在六盘山开成路夏宫，郭琮囚闭赵炳等于平凉北崆峒山。相距数百里，也是为了对阿难答封锁消息。以上引文中两次使用“嗣王”，而不称“安西王”，说明阿难答仍未封王。屠寄《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传》称：“袭封之命当在十六年，《诸王表》云十七年封，误也。”没有任何证据。而《诸王表》仅云十七年忙哥剌薨，并未记阿难答即位事。此十七年实为十五年之误。

赵炳被囚，其子赵仁荣赴京师向忽必烈上诉。忽必烈“即诏近侍二人弛驿而西，脱炳，且械琮党偕来。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平凉狱中。”“年五十九，实十七年三月也。”“帝闻之，抚髀叹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余人至，帝亲鞫问，尽得其情。”② 具体详情，商挺墓志有所透露云：

> 至元十五年冬，（安西王忙哥剌）薨，王子哈达（阿难答）当嗣。王妃命公请于上。上曰：“齿弱，祖宗之训未习也，卿姑行王相府事以俟。初运使郭琮、郎中令郭叔云，与王相赵炳构隙相攻。人或谓赵炳不法，王妃令囚之六盘狱以死。朝廷疑擅杀之，遣二郭，鞫问伏辜，事

①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②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无一毫及公，惟王府女奚寨察尔以预二郭谋。将刑，规以求生，始有暧昧语，谓公及其子琎亦知之。上怒，召公拘于赵氏，琎下狱。①。

商挺出身儒生，事发后诸儒为其奔走说情，墓志中当然也有隐晦之辞，一看就明，但事情的大致原委还是看得出来。忙哥剌至元十五年冬季死，阿答答生母王妃命其请奏忽必烈帝，允阿难答嗣位，十五年，十六年两次，均以年少不允，忽必烈谕以"卿姑行王相府事以俟"。可见阿难答至十六年仍未嗣位。王妃命其一再奏请，可知王妃、阿难答与商挺的关系甚密。十六年冬赵炳入朝奏事，揭发二郭的不法行为，郭琮假嗣王旨拘赵炳及其家属，后王妃又命囚之于六盘（平凉崆峒山）狱杀之。可见王妃参与这种不法行为，或者说是主谋。王妃把责任推至王府侍女奚察察尔，临刑，奚察察尔透露了一点真情，涉及商挺。商挺被捕，诸儒纷纷为其说情。数年后，忽必烈才答应不可全以无罪释之，籍其家。赵炳死于至元十七年三月，此案审讯过程达四年多之久。在审案过程中，忽必烈因安西王妃直接涉及案件，不可能在此时命阿难答嗣位。所以屠寄阿难答十六年嗣位说，根本不能成立，十七年说也不能成立。

在赵炳被害，商挺被捕，案件审理过程中，又发生了另一安西王相李德辉病死于黄平（贵州黄平）的事。十七年冬，"西南夷罗氏鬼国叛"，诏李德辉将兵前往。德辉至，招谕降之，"改鬼国为顺元路"。十一月二十一日，至黄平，病，二十七日卒。"后七日，资政大夫、中书左丞、安西行中书省之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注引，《丛书集成初编》。

命下"①，当时王相府已罢，以行中书省取代安西王相府的决策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安西王位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仅仅成了宗王府。阿难答嗣位的诏令，未见记载，可能是后来因习继承的。

忽必烈在罢王相府后，还接连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原安西王的职权。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诏京兆（安西）、四川分置行省于河西"②，即后来设置的甘肃行中书省，河西与安西王府脱离。同年，博罗欢以中书右丞行省甘肃。十九年（1282）以不花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汪惟正为左丞。以杨文安为四川参知政事③。二十年（1283），"定拟安西王相府首令官、令史，与台、院吏属一体迁转"④将原王相府的官员转入行省地方官府，裁撤王相府官吏。同年十一月，"罢开成路屯田总管府，入开成路，隶京兆宣慰司"⑤，将安西王相府所管开成路屯田归地方政府。

忽必烈在采取上列措施的同时，并未收取安西王和秦王印，印仍在王府，因而阿难答掌握安西王印，其弟按摊不花掌握秦王印。《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年五月，"敕以陕西按察司赃罚钱输于秦王"。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以别速带逃军七百余人，付安西王屯田，给以牛具。"从这两条诏文来看，安西王和秦王已经分别即位，而且得到忽必烈的认可，并给以资助。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已酉，元世

①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②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③ 《新元史》卷三二《行省宰相年表》上。
④ 《元史》卷八四《选举志》。
⑤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祖“为皇孙阿难答立衍福司”①，设立官制，这可能是对其削权以后的安抚措施，藉以缓和祖孙之间的紧张关系。

安西王、秦王的名号打出后，立即引起朝臣的不满。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中书平章政事桑哥奏言：

> 先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统河西、土蕃、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给二金印。今嗣王阿难答仍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别用秦王印，其下复以王傅印行，一藩二王，恐于制非宜。

忽必烈得奏后，立即下诏：

> 以阿难答嗣为安西王，仍置王傅，而上秦王印。按摊不花所署王傅，罢之②。

但是，这个问题仍迟迟不能解决。阿难答暂时保留王位，并置王傅，他并不满足；而按摊不花不仅收缴了秦王印，而且撤去王傅官，他也不愿意，继续对抗。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元世祖又下诏：“罢皇孙按摊不花所设断事官也先，仍收其印。”③ 次年五月，又诏：“罢秦王典藏司，收其印。”④ 按摊不花所设王傅官及其下属机构，至此才算彻底解决。

在解决了“一藩二王”和相府印之后，按摊不花的权力全部并于安西王阿难答。而阿难答以为时机已到，又向忽必烈提出要求。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安西王请仍旧设常

---

①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②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蒙兀儿史记》卷八《忽必烈可汗本纪》。
③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 《元史》卷十六《世祖纪》十三。

侍。”元世祖不允①。八月，忽必烈下令：“给安西王断事官印。”② 十二月，诏令“以铁赤、脱脱木儿、咬住、拜延四人，并（为）安西王傅。”③ 安西王相仍不允设置。但阿难答并不死心。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原太子真金之子皇孙铁木耳继位，号成宗。阿难答乘铁木耳新立，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要求恢复原安西王的权势。元贞元年（1295）二月，在阿难答的支持下，“安西王相（应为傅一引者）铁赤等复请立王相府”，元成宗当即拒绝。次年正月，安西王傅铁赤、脱铁木而等又至京师“复请立王相府”，成宗予以严辞批驳：

> 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④

这个答复是十分严肃的，“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一语道破了阿难答再三要求设王相府的目的。明确提出“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自忙哥剌死后，忽必烈即为此而不断努力。阿难答野心勃勃，忽必烈早已清楚，所以采取措施削弱其权势，始终不允其设王相府。成宗谙于情面，而且新即位后需要处理好与叔伯兄弟之间的关系，允其设王相府，只行王傅事，实际是换汤不换药，只行王傅职权，不得干预朝廷和行省军政大事。

大德十年（1306）八月，“开成路地震，（安西）王官及

---

①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②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③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④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① 这对安西王是一次沉重打击。据《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传》屠寄注；“所谓秦王，指忙哥剌”，秦王妃也就是忙哥剌妃。元成宗虽然采取了一些救急措施，给以银、粮、但恢复元气已经不可能了。

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死，皇后伯要真氏无子。阿难答等急至京师，伯要真氏与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谋：“伯要真氏称制，阿难答辅之”②。又议谋立阿难答③。左丞相哈剌哈孙与阿沙不花得悉，密遣使报北边怀宁王海山与出居怀州的亲王爱育黎拔力八达④。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等议：“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之。”⑤ 爱育黎拔力八达拥太后自怀州入京师，杀拥立阿难答之阿忽台等，迎海山、废伯要真氏，后赐之死，并杀阿难答等。至此，安西王阿难答以彻底灭亡而告终。

从至元五年（1268）忙哥剌以亲王奉诏出京兆，后封安西王，至大德十一年（1307）阿难答被杀为止，历对四十一年。其中忙哥剌任安西王七年，阿难答任二十六年（从至元十九年算起）。前后比较，这四十一年虽是元朝的鼎盛时代，而忙哥剌在位的七年，又是安西王的黄金时代，权大位尊，盛极一时，非其他诸王相比，同时他也为元朝镇守西土，实现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阿难答时期，元朝政府正致力

---

①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卷五十《五行志》一；《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②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③ 《元史》一一四《后妃卜鲁罕皇后传》。
④ 《元史》卷一六三《哈剌哈孙传》、《阿沙不花传》。
⑤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于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国财政、军事；阿难答本人一开始就给了忽必烈以不良印象，自身存在不少问题，忽必烈始终对其不放心。从大局到局部，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忽必烈不断对其削权，而他始终为此不平。最后野心暴露，要篡夺政权，失败而死。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诏"改安西路为奉元路"①，连"安西"这个名称也不让存在了。

历武宗、仁宗、英宗三代十五年，泰定帝即位，于至治三年（1323）九月下诏：以"诸王月鲁铁木儿袭封安西王"②。月鲁铁木儿是阿难答之子，即位不到半年，因与铁赤等谋逆，被流放到云南，不久放还。至顺三年（1332），月鲁铁木儿"坐与畏兀僧王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杀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③

月鲁铁木儿流亡云南时，安西王封地已经更换了统治者。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四月，"命昌王八剌失里往镇阿难答昔居之地，并赐牛马橐驼。"④可见这个地方已经败落下去。三年（1326），"命湘宁王八剌失里出镇阿难答之地。"⑤至顺二年（1331）三月，元文宗又命诸王阿鲁出镇陕西⑥。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封（中书左丞）伯颜为秦王，锡金印"⑦。这仅仅是一种王号，与安西王忙哥剌时的秦王没有任何关系了。

月鲁铁木儿死后二十五年，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等还住在

---

①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②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卷一〇八《诸王表》。
③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④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一。
⑤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一。
⑥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⑦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

京兆安西王邸。《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记：

> 至正十七年（1357）春，红巾陷商州，夺七盘，进据蓝田县，距奉元一舍（一站——引者）。思诚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鲁贴木儿邸。

物已易主，宫邸仍在。此时距元朝灭亡，仅仅只有十一年了。

三、安西王的辖区

早在成吉斯汗统一大漠南北草原时，兄弟们即约定："取了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① 这与他们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由此而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相适应的。成吉斯汗西征中亚返回时，首先将他的四个儿子或称"四根柱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分封，后建立起四大汗国。其他诸子、兄弟、叔伯、功臣等也分别得到封赐。和林以东的称东道诸王，以西的称西道诸王，各有封地，"赐印握兵，有事从行院征讨。"②。"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③ 大汗企图通过这种分封，将政权、军权、人权、财权掌握在以他为首的蒙古贵族手中。

成吉斯汗死前，指定三子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窝阔台即大汗位以后，自身已经是大蒙古国的共主，并仍拥有自己的分地窝阔台汗国。为了镇守"西土"，将其三子阔端安置在凉州（甘肃武威）。阔端开土广境，最后占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大部，还把势力扩展到四川、西藏。在拖雷系和窝阔台系诸王争夺大汗继承权的斗争中，拖雷系的蒙哥获胜，夺取政权，阔端恰与此时逝世，王位由其三子只必贴木儿继承，但势力大大缩小，不能与其父阔端相比。拖雷的儿子蒙

① 《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② 《蒙兀儿史记》卷一五《诸王表》序。
③ 《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序。

哥即大汗位，蒙哥汗将拖雷的三子忽必烈分封在关陇，“出王秦中”，实际上继承了阔端王的分地。忽必烈即大汗位，又将关陇地区分封其三子忙哥剌，称安西王。以上都是“三子”掌握“西土”的大权，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自成吉斯汗开始以来至忽必烈即位，所分封的诸王，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国邑之名”①的诸王，一种是仅有王号，而无国邑。两者大都可以“诸王”，“宗王”概括，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无国邑之名的封王，往往先冠以“诸王”、“宗王”，后称其名。有无封邑，或封邑大小，主要取决于同大汗关系的亲疏，功绩的大小。中统至至元前期，忽必烈所封诸子，大都是有封邑之王，使其在边疆镇守一方之地。

封邑和辖区有所不同。封邑一般指的是领地，封王对封邑的军事、政治、财税、民事有直接管理权，王死后，多数由其子继承，但要经中央批准。辖区是封王承制扩展的地方，权归中央，封王奉诏行事，可以说是他的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地。子孙对辖区的管辖没有继承权。阔端“镇西土”，凉州是他的封邑，死后由其子只必贴木儿继承，其他辖区，权力归中央。忽必烈在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只必贴木儿不仅站在忽必烈一边，而且当阿里不哥、阿蓝答儿等叛军攻入凉州时，他支持忽必烈的部下参加战斗，王府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忽必烈即位后，即于至元二年（1265）下令：“诏并诸王只必贴木儿所设管民官属”②，与地方政权机构完全脱离，以后仅仅领有凉州的一小块分地。

---

① 《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序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成吉斯汗时期的封地与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封地也有所不同。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斯汗分封的土地，是按其游牧民族的传统，依血亲近疏、军功大小进行分配，权虽归大汗，但受封者对封地的支配权很大，封地实际具有军政管辖区的性质，一块封地就是一个管辖单位，不受其他机构的制约。但是，忽必烈即位后，全国统一大业逐渐完成，中原农业地区先后属于元朝统治之下，中原历代王朝的各种制度在蒙古统治者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加强中央集权制在忽必烈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原地区传统的“众建子弟，以藩王室”① 制度继承下来，明确规定了分封诸子，是为了保卫中央政权，为中央集权制服务。“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②，把游牧民族的分封制与中原传统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中统元年（1260）八月，设立的陕西四川行省（又称秦蜀行中书省），是年初所设十路宣抚司之一京兆等路宣抚使的发展，也是“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③ 的具体体现。中央设中书省，真金领中书省事。地方因事需要，由中书省派人行中书省事，称行中书省。不过，在至元中叶以前，行中书省多数是不固定的，大都是因需要而设，以后才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

中央总兵权者为枢密院，因战事需要于地方设行枢密院，以总地方兵权。行枢密院是枢密院的派出机关，有的与行中书省辖区相符，有的不相符，战事结束后即行裁撤。以后又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如至元初于成都设西川行枢密院。后于

① 《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
② 《申斋文集》卷六《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
③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即位诏》。

重庆设东川行枢密院，都在秦蜀行省辖区。行省官员不兼行枢密院职务者，无权干预行枢密院事。

中央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地方设行御史台。行御史台下设肃政廉访使司，监察各级官吏政绩。

在边疆和新占领区，行省以下设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①

以上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制度，保证了中央政令、军令的统一，与大蒙古国时期分封诸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在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忽必烈及其以后分封的诸王，都要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而且同时也要受这些制度的约束。

至元九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决定的。《元史·世祖纪》：

> 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

《诸王表》：

> 至元十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 至元九年十月丙戌，封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置王相府，以商挺、李德辉为王相。明年，燕王立为皇太子，忙哥剌亦晋封秦王，别赐秦王兽钮金印，其安西王螭纽金印兼绾如故。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在长安者曰安西，在

① 《元史》卷九《百官志》。

六盘者曰开成，皆号上路，王相府冬夏分驻焉。（原注：夏驻六盘，冬驻长安。）

根据以上记载：京兆、六盘，换句话说，安西路和开成路是他的分地，亦即领地。河西、吐蕃、四川、是他的辖区。这里分地和辖区，界限是分明的。对于封地，一切归安西王忙哥剌；辖区总揽“军民之政”，亦即驾临于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之上。忽必烈封忙哥剌为安西王，忙哥剌就要代表皇室实行对辖区的管理。

分地指京兆路和六盘山。忽必烈将京兆府和六盘山分封给忙哥剌，原因是早在至元五年（1268）刘好礼已经建言：“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①，指出陕西地位的重要性。实际上早在蒙哥汗时期，姚枢就已经向忽必烈建议：“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②。这仅仅是就地理条件、物产而言。忽必烈出王秦中时期，更加明白关中所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刘好礼建言后，忽必烈即以忙哥剌为亲王镇陕西。六盘山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是因其“扼秦陇吭，俯瞰全蜀，成吉斯汗晚年征西夏，尝置老营，即山避署。蒙格汗车驾入蜀，亦留出卑可敦及辎重（于）山上，……固王师后路……为西土重镇焉。会朝议三道伐宋，丞相伯颜取中道，自襄阳浮汉出江。而蜀据大江上游，……尚为宋守，朝廷分置东西两川行枢密院讨之。”③ 安西王领有关中、六盘，不仅成为三道伐宋西路军的指挥部、供给基地和与京城联系的据点，而且，占领六盘山，战略上就可控制秦陇，达到以“镇西

① 《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②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③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土”的目的。京兆和六盘山可互相支援。

兼辖区包括陕西、河西、吐蕃、四川等。

陕西京兆历代为全省中心，都会置此。中统初，廉希宪任陕西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省城设于京兆。不久，赛典赤赡思丁接行省事，移府兴元（陕西汉中），京兆成为忽必烈的藩邸。所谓陕西五路，指原金朝的京兆府路、鄜延路、庆原路、凤翔路、临洮路，实际包括关中地区、陕北、陇东、渭水流域、洮河流域等，西以黄河为界。京兆路是五路之一，陕西行省有时又作京兆行省，因出镇陕西，治所在京兆，辖区包括京兆等五路。至元十年（1273）安西王益封秦王，同年，改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①，实际上是为安西王接管陕西、四川，让开地方。金鄜延路不包括察罕脑儿（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元陕西五路包括察罕脑儿及其附近地区。占有兴元路后，辖地包括汉中、安康。

河西（蒙语又译为合申）原为西夏（蒙语又译为唐兀）王朝的辖地，后因大部分领土在黄河以西，元称河西。都城在中兴府（宁夏银川），元改为中兴路。蒙古灭西夏后，阔端王开府凉州（甘肃武威），原西夏领土属阔端王的辖区。中统到至元初，元朝数次在河西地设西夏行中书省（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毕即罢，都是临时派置。至元十年，罢西夏行中书省②，军民之事归安西王忙哥剌。

四川原为南宋辖境。阔端王招降汪世显后，蒙古大军经石门顺西汉水抵成都，占领四川中部地区。中统元年（1260），“立秦蜀行中书省，以京兆等路宣抚使廉希宪为中书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②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省右丞，行省事。”[①] 三年（1262）七月，“以夔府行省刘整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②] 四年（1263）正月，诏“东西两川隶征东元帅府”[③]。七月，设西川行枢密院。至元五年（1268），“立东西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④]，后改东西川行枢密院。安西王忙哥剌到任后，军政财税都置于安西王相府管辖之下。

吐蕃先属阔端王的辖区。蒙哥汗即位，阔端死，吐蕃统一于大蒙古国蒙哥汗，只必贴木儿没有继承这一辖区。蒙哥汗封忽必烈“出王秦中”，吐蕃地区也就属于忽必烈的势力范围。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军驻六盘山，派人从凉州迎请萨迦派佛教大师萨班来会，萨班年老不便远行，由阔端之子蒙哥都陪同八思巴至六盘山与忽必烈相会。交谈后，十七岁的八思巴学识超群，深得忽必烈的敬重，遂尊其为上师。同年十一月萨班病逝于凉州；此前八思巴赶回凉州，接受了萨班的衣钵、法器，成为萨迦派的教主。

次年（1252）忽必烈由六盘山起程，率军经吐蕃地区进攻四川的南宋势力，至甘肃临洮，八思巴也从凉州出发，向川西北的朵甘思藏区。三年（1253），忽必烈在进军云南大理途中奉诏北返，八思巴得讯前往，在忒剌与忽必烈相会，再次表示对蒙古国的忠心。五年（1255），八思巴追随忽必烈到达开平府（后为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以后忽必烈专为他修了宫殿。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④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汗位，八思巴立即受封，尊为国师，“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①。“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②，这就是后来（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为宣政院，以统吐蕃等处的前身。不久，八思巴返回西藏，创造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字成，回到大都，忽必烈“诏颁行于天下”，“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辅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③八思巴在制造蒙古新字期间，还与蒙古官员清查了吐蕃各部的人口、户籍，加强了对藏区的管辖。

在颁行蒙古新字的同年（1269）十月，忽必烈汗封奥鲁赤为西平王，赐驼纽涂金银印，管辖吐蕃地区。九年（1272）正月，给西平王“马价、弓矢，敕与诸王阿鲁贴木儿、秃哥、秃鲁所部，及西蜀都元帅也速答儿部军，并忙古带所辖玉速公弄等十八族吐蕃军同征建都，全军受王节度”④。《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建昌路建安州条下记有“元至元九年，西平王平带蒂”事。西平王进军方向在川西，与西蜀都元帅也速带儿东西合击叛军。

这次平叛战斗进行了两年之久。在平叛过程中，忽必烈汗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吐蕃又成了安西王的辖区。安西王与西平王同管吐蕃，关系如何处理，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蒙兀儿史记》卷一五〇《诸王表》第二称：“蒙兀宗室、驸

---

① 《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王磐《八思巴行状》。
②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并云：“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
③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八思巴传》。
④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西平王奥鲁赤传》，并见《元史·世祖纪》四。

马，通称诸王，赐印握兵，有事从行院征讨。”“然初制简略，位号无称，惟视印纽为差别。中统以后，始有国邑之名，而印纽仍分六等。”这六等次序是：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度银印驼纽，金度银印龟纽等，忙哥剌以安西王得金印螭纽，以秦王得金印兽纽，属一、二等王，而奥鲁赤仅为驼纽涂金银印，即金度银印驼纽，属三等，位在忙哥剌之下，自然要受安西王的节制。但在具体事件中，则不然。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敕安西王忙哥剌、诸王只必贴木儿、驸马昌吉，分遣所部从王（指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这次从安西王调出的部分军队，战争中要受西平王的指挥。就大局而言，吐蕃地区归总制院，局部而言“西土”总于安西王忙哥剌，具体事件西平王可奉诏行事。吐蕃是安西王的辖区，但并不影响西平王及其他诸王的存在。至元十五年忙哥剌死，十七年罢王相府，后继者失去对吐蕃的管辖，十九年以后，西平王奥鲁赤的作用就越来越显著了。

姚燧《延厘寺碑》对安西王的领地、辖区及其有关情况也有一段叙述，云：

> 其时，犍河之外，秦国内地，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诸侯王、鄙牧、蕃首，星罗棋锴于是间者，靡不舆金、饘帛，效马、献琛，辐辏庭下，勃碣、竭蹶，如恐于后。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
>
> 夏则乐其高寒，即六盘居。……然以其地介乎凉、陇、羌、浑之交，时平则列置监牧，攻驹而蕃息之；有警则命将出御，无有常制，四海无所为而至者。惟世祖（忽必烈）渊龙之加兵大理也，既尝祃牙于兹，及平而归，又

饮至焉，最其驻跸，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遗泽馀波，深浃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辅天子宽西顾忧者，又不百世而止也①

这段记述较前所引更为详细、具体。忙哥剌至元九年受封，次年至长安，“以渊龙所国国之”；“夏则乐其高寒，即六盘居”。这是他的领地。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这是他的辖区。陇指陇山东西，包括陕西行省。凉指凉州，包括河西，这里也有一部羌人。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诏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②。中兴“羌俗素鄙野，事无统记，公求蜀士为人仆隶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羌人始遣子弟读书，土俗为之一变。”③ 羌人亦指吐蕃。《元史》卷一六七《张庭瑞传》：“蜀平，（庭瑞）升诸蛮夷部宣慰使，甚得蛮夷心。碉门羌与妇人老幼入市，争价杀人，碉门鱼通司系其人。羌首怒断绳桥，谋入劫之。”“羌俗暴悍，以斗、杀为勇。”“杀人偿死，羌与中国之法同。”“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碉门，鱼通，在四川雅安西北，这里是元宣政院的辖地，今川西藏区，此羌指藏民无疑。

六盘介乎凉陇羌浑之交中的“浑”，指此前的土谷浑、退浑，亦指吐蕃统治下的役仆，后融合于藏族。《元史》卷一七〇《袁裕传》：“西夏，羌、浑杂居”。此指至元八年（1271）袁裕任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时听到的说法，此浑即西夏王朝统治下的部分属民，还广泛分布于西夏地区和吐蕃地区。六盘山曾是金、西夏分界之所，故有“介乎凉、陇、羌、

① 姚燧《延厘寺碑》。
② 《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③ 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元文类》五八。

浑之交”说。

凉指凉州，《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记：“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此时，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区，已从中兴向西，包括凉、甘、肃、瓜、沙等州。至元十三年(1276)表裕由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进为甘州等路宣抚副使，并于次年移镇甘州（甘肃张掖），仍管中兴等路①。凉、有时具体指凉州，历史上也泛指西凉，“五凉”，包括今甘肃全境。

以上所述，与《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传》所记的领地、辖区完全一致，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西藏等省区。

碑文还对辖区内的政治、管理方式作了简要叙述。在辖区内，“诸侯王、郡牧、蕃首，星罗棋错于是间”。诸侯王指蒙古宗室分封的宗王、驸马王，还有居住于武威的畏兀尔高昌王亦都护。其中受封最早的是阔端王之子诸王只必贴木儿。至撰写碑文时，辖区内的诸王已达十余人之多。郡牧泛指辖区内行省地方官员。元代行政区划，行省下为路、府、州、县，各级有相应的政、军、监察、税课等设施和官员，这里均包括在“郡牧”之内。蕃首指各少数民族首领。元代的“西土”地区，民族成分极为复杂，各族均有自己的首领，忙哥剌时期，这些首领都属安西王府管辖。这三大类官员，星罗棋错分布于“西土”地区，他们为了效忠于安西王，无不争

① 《元史》卷一七〇《表裕传》。

先恐后载金、篚帛、供马、献宝，而安西王则“承制”赏赐、授官，实行有效管辖，“为天子援枹鼓、进退诸军于外，以捍侮西北”①；对忽必烈的统一大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上述陕西五路、四川、河西、吐蕃等地区外，忙哥剌时期，安西王的辖区还扩大到领近省区。

早在忽必烈“出王秦中”时，蒙哥汗即曾“割河东解之盐池归陕西”②。河东即黄河蒲津渡以东，今山西西南部，元代属中书省。解即解州，古解虞地，在山西安邑南。这里自古盛产湖盐，晋、豫、陕等省居民仰此为生。“安西王国秦，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③安西王受封河东解池之盐，不仅设置官吏，对解州等地实行行政管辖，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盐运至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实行盐业专卖，收取赋税，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大汗就曾下令：“敕总帅汪忠臣、都元帅贴的及刘整等益兵付都元帅钦察，戍青居山，仍以解州盐课给军粮。”④可见，当时解州盐课在统一四川的军事行动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在以下财政收入一节中还要讨论，这里只说明安西王的辖区已扩展至中书省的晋西南地区。

忽必烈得封关中时，蒙哥汗曾对其说：“（关中）是地户寡，河南怀孟，地狭民瘠，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内。”⑤怀即怀庆路，治今沁阳；孟即孟津，今偃师北；河内指古河内郡。

---

① 见上引姚燧《延厘寺碑》。
②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③ 姚燧《故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四。
④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⑤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换句话说，今河南郑州以西，元中书省的怀庆路，河南行省的河南府路，都属忽必烈封地。忙哥剌得封安西王时，也继承了这块封地，而且略有扩展。《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至元二十二年（1285）条记："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亲王镇之。"汴梁在今开封，江指长江，汉江，安西王的势力还曾达到过开封以南。

至元十二年（1275）姚燧"以秦王命，安辑庸、蜀"①。蜀指四川，而庸不属陕、川。庸，原属金京西南路，后隶南宋利州东路。大蒙古国贵由汗时期，夹谷直上言："兴元（陕西汉中）形势，西控巴蜀，东扼荆襄，山南诸城，无要此者，自始取道灭金，汉中无岁无兵，其地与民，吾弃不有，敌不敢复，城郭坠而弗完，田野毁而辍耕，民窘艰食。……诚能留兵戍守，招徕未降，民见父子不分，货钱之得有也，其至恐后，为择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与种牛，俟秋谷收，什税四三，储之于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师，朝至而夕廪焉，校以资粮关中，荷担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劳费大省，实制蜀一奇也。""诏行省兴元。"②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伐宋大军，由西路调往中路，在今湖北大江两岸以攻宋军。庸在湖北西北，为忽必烈军事活动区。元设湖广行省，庸地属焉。而在此以前赛典赤赡思丁行省兴元，势力曾达到庸地。至元十年（1273）赛典赤赡思丁调离陕川，移省云南，故有派姚燧"安辑庸蜀"之事。

从窝阔台汗取汉水道灭金，贵由汗以汉中为根据地资粮入蜀，赛典赤赡思丁行省兴元以控秦蜀，庸地不时归秦蜀管

①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② 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

辖。姚燧在赛典赤离开后二年奉秦王命，安辑庸蜀，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庸地一度归秦蜀管辖。安西王得封后，庸属安西王，安西王辖地扩至湖北西北。

《蒙兀儿史记·忽必烈可汗本纪》："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诏安西王相府及四川行省四道宣慰司，抚治播川务川西南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播川（贵州永安）属播州（治贵州遵义）宣抚司，后并属湖广行省。其西南之亦奚不薛（贵州大方），安西王多次派官宣抚。次年，王相李德辉亲自至播州，年底病死于黄平（今贵州黄平）。可见安西王的势力还达到贵州大部。

元云南行中书省设于至元十三年（1276），此前，赛典赤从至元元年（1264）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时，云南属之。此时忽必烈还封其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设相府。十一年（1274），忽必烈曾谕赛典赤："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① 赛典赤退出，即访求云南山川地理。此时赛典赤虽离开陕西，但仍受安西王节制。与此同时，安西王大军入蜀，灭南宋残余势力，军队多次进入云南。可见安西王忙哥剌时期，势力还扩大到云南北部的一些地区。

根据以上所述，忙哥剌时期，安西王以京兆，六盘为分地，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宁夏、青海、西藏等地，还扩展到内蒙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北部，这是安西王极盛时期的辖区。另外，据《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九年（1282）六月，"发六盘山

①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屯田军七百七十人，以补刘恩之军。”刘恩在至元初年以都元帅驻兵四川。至元十二年（1275），安西王忙哥剌召刘恩从嘉定至六盘山，议论取蜀方略。十六年（1279），派刘恩率蒙古、汉军万人西征斡端（和田）①，平叛王。和田不在安西王辖区，而王相府要按世祖诏令“承制”办理天山南部军事，屯田等事宜。

忙哥剌死后，王相府罢。嗣王阿难答即位后，辖区、职权大大缩小。除继承了忙哥剌的部分领地外，辖区所剩无几。部分领地指京兆路（安西路）的一部分，和开成路的一部分，而大部分属县归入行省管辖。

① 《元史》卷一六六《刘恩传》。

四、安西王的宫邸建筑

《元史·诸王表》：

> 至元十年，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

这是修建宫邸的诏令，也是修建宫邸的开始。

长安为金京兆路和京兆府的治所所在。忽必烈以关中为藩邸，治所也在长安，六盘为夏居之地。忙哥剌以亲王镇秦蜀，来往于京兆、六盘间，长安为主要驻地，但都未曾修治宫室宫邸。《元史·赵炳传》：

> 至元九年，帝念关中重地，风俗强悍，思得刚毅旧臣以临之，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

赵炳任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在至元九年上半年，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在至元九年十月，而修治宫邸的诏令颁发于十年，也就是说在安西王益封秦王时。赵炳时任京兆路总管兼府尹，所以宫邸建筑，悉听炳裁制。

赵炳原来就有修建城邑的经验。早在忽必烈即位前，“次桓（开平西南，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抚（抚宁，辽宁抚宁）间，以炳为抚州长，城是规制，为之一新”①。忽必烈以“刚鲠”使其主京兆。忙哥剌开府于秦，又诏其修治宫室。京兆

①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安西王城、宫邸，由赵炳主持修筑。为修筑王城，赵炳四处采访，收集资料①。

元李好问《长安志图》（辑本）：京兆城东北隅，有元安西王宫。高廷法等嘉庆《咸宁县志》卷四《元奉元城图》："旧志云，元世祖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今名其城为阿尔朵，即今斡耳社，故址犹存。"又同书卷一《疆域山川经绵道里城郭坊社图·斡耳朵社图》：清塘坼垛社位于西安城东北，距城东北角（直线距离）约七华里，北为辛家庙、午门社，东北为沙谷堆、李家堡、新庄、周家集、老人仓、杜家亍，东为米家崖、庄里，东南为韩森寨、杨家湾、十里堡、何家街、李家街，南为张家庄、胡家街、尹家街、田家街、孟家街，西为午门社、李家村、康家村、杨家村、三府凹、石家街、秦家街（以上依距离远近排列），社 中心为斡耳朵。

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西京斡耳朵考》："距石碑寨不远（实测约二华里）有一城址，俗名达王府，此乃北墙也。此外名斡耳朵者，共一十九村，即杨家庄、三府凹、康家村、李家村、胡家庙、孟家街、秦家街、李家街、老人仓、石家街、何家街、张家庄、杜家街、尹家街、田家街、东十里铺、张家庄村、新家庄村、米家崖、庄里等村。与《咸宁县志》相比，范围要小，缺沙谷堆 、李家堡、午门社、辛家庙、杨家村、张家庄、韩森寨、杨家湾等村。前者为清斡耳朵社所属村庄，后者系考元代安西王城所属的村街，两者概念、内容不同。

陈子怡《西京斡耳朵考》还记："元代安西王之斡耳朵，大约东西南北当以五六里（华里）为度"，"中间是王宫""查

①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年。

县志：今何家街改苏家街，李家街改王院门，胡家街曰胡家庙，周家街曰周家坡”，孟家街“其西北有关帝庙，中有小学，曰斡耳朵小学，盖此社之首村也。东邻田家湾（田家街）为一大堡子”。“此街一曰围墙子，一曰前院门，当是王宫之前往来大道也。”又记：杜家街和尹家街，新图作“黄家街”。王院门，当东小门。东交门即东脚（当为角）门。苏家街，南临铁道。田家街当是正门①。

1956年冬，安西王宫殿的基址——台基被基建工地挖去了一部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得知后，即进行调查和保护。1957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又进行了复查，并将城址和殿基的范围作了勘测，知“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北约三公里，南距秦家街120米，东距浐河2公里许”。据图：秦家街在城南略偏西，孟家街在城南略偏东，田家街在城东南角，秦家街距南城墙200米，孟家街距南城墙约300米，田家街距城墙东南角约300米②。因之京兆城在王城的西南方向，王城道路是先向东南会大道，然后折向西南入京兆城，所以，来往必须出王城门，经田家街。田家街一曰前院门，当时在王宫前通往京兆城的大道旁。安西王城附近的街道，大多数也分布在城东南方向，即大道两侧，原因在于此。

安西王城地址既明，接着研究王城的布局和建筑。

《延厘寺碑》记：

> 至元九年，诏立皇子为安西王，以渊龙所国国之。明年至长安，营于灞浐之西。巍殿中峙，卫士环列，车间

① 陈子怡《西北访古丛稿·西京斡耳朵考》，《西京筹备委员会丛刊》之一。
② 马得志《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容车，帐间容帐，包原络野，周四十里。中为牙门，讥其出入，故老望之，眙目怵心，贪吝啧啧，以为有国而来，名王雄藩，无有若是吾君之子威仪盛者①。

《蒙兀儿史记·忙哥剌传》在引用了以上文字后，接着称：

以为威仪之盛，虽古之大举于无以过也。

"营于素泸之西"，指城在泸河之西，实际东距泸河2公里许。毳殿中峙，指大殿（王宫）峙立在王城中部，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反映当时这里还没有修建起规划一致的大街小巷，而是车、帐交错。车是蒙古人游牧、迁徙、行军的交通工具，也有供战争需要的战车；帐是帐蓬，居住之所。车平时排列整齐，俨如巷道，也可作为防御设施；帐蓬置于车巷之间，供人居住、生活。车巷东西南北交致，帐蓬布列于其间，大巷包小巷，帐蓬连帐蓬，从远望之，车间有车，帐间有帐，与一般城市不同。

王城周围，是一片平原，东至泸河2公里许，北距渭河12公里，南临大道2公里，西至京兆城东北郊。在此范围内，除渭河滩地当时沼泽水洼众多，不能居住外，其余均可住人或布列车帐，周四十里，即在此范围内。

至元十二年（1275），即安西王城完工之初，意大利人马哥波罗被忽必烈派遣，路过于此，以后在他的游记中记载：

我们到京兆府大城，这城实在是大而好看，是京兆府国的都城。这国古代是大国，富厚强盛，有许多贤圣的君主治理人民。但现在这地君主名忙哥剌，是大汗之子。他父亲把这国封给他，命他做这国的王。城里商工

① 姚燧《牧庵集》卷十。

业皆甚兴旺，出产丝极多，各种金丝布皆在那里制造的。军队用的各种器具也皆在此制造的。各种养生的必需品皆很丰富，并且价钱很低。城在西面（按指此京兆城在安西王城西面），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

城外有忙哥剌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很厚很高的墙，周围五迈耳（冯承钧译本作五哩）。建筑极佳，并设有统眼（夏鼐按：应译作“设有雉堞”）。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围墙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忙哥剌治国贤明，公平无私，人民很爱戴他。宫的四周有兵驻防，野禽、野兽，给他们许多娱乐（冯译本作“游猎为乐”）①

这段文字，生动、具体、细致地记述了安西王城的位置、建筑、装饰、兵力布置、生活特色等，此时距王城开工仅三年，一座美丽壮观的王城及其宫殿已经全部完工，而且装饰得非常华丽。不仅城内有许多禽兽，城外也有野禽兽，供王府官兵“游猎为乐”，形象地点出了蒙古人居住在农业地区后，仍保持着他们的习俗和爱好。

考古发掘证实了以上记载。马得志《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中说：

安西王府的城垣，除北城墙（即上引陈子怡文“距

① 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25页。

石碑岩皆不远，有一城址，俗名达王府，此乃北墙也”。）基保存较好，还可看出一些形迹外，其他三面均埋于现在地表以下，看不出墙的痕迹。但经钻探得知，城基均完整，全是板筑夯土，夯层坚硬平整。四面城基的宽度不太一致，北城基宽（厚）9，西城基 8.2，东城基和南城基相同，皆 10 米，东西二城基南北长各 603 米，南城基 542，北城基较南墙略短，长为 534 米，周围 2282 米。城垣的平面基本呈长方形，方向北偏西 3 度。城的四角均向外突出，突出部分的平面近半圆形。直径在 29—30 米左右。从其形制及附近堆积的砖瓦来看，城的四角可能有角楼一类建筑。

根据钻探所知，此城仅东、西、南三面有门，东西二门基本是对称的，东门距城东南角 342 米，西门距城西南角 340 米，二门大小亦相同。门基宽 14 米（因破坏其长度不详一原注），都是一个门道，宽皆 5 米。在门基上和周围附近堆积着大量的砖瓦，其中瓦片除有灰色板瓦外，还有很多黄釉的所谓琉璃瓦；在东门门址中还出有黄釉龙纹的滴水瓦，及线雕的石刻残片。……南门略偏东，距城东南角 252 米，西距西南角 290 米。门基宽亦 14 米，也是一个门道，惟宽 12 米，较上述二门宽一倍多，当是宫城南面的正门。

根据以上报告，我们可以看出，此城是长方形，城周为 2282 米，即 2.282 公里，折合华里为 4.564 里。这大概取墙基中心线，若取外边线，肯定大于此数。马哥孛罗称“周围五迈耳”，近似 5 华里。

城有东、西、南三门，而无北门。此与城北不当交通大

道，当时人口稀少有关。三门中南门最宽，是东、西门的一倍多，说明此为正门。门外为秦家街、田家街、孟家街等，也反映正门外人户众多，地位重要。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通行京兆城方便，遥望京兆。

城形取长方形，比正方形略长，王宫在中间，当三门之冲，这大约是赵炳取中原城邑建筑的传统。然而四城角取圆形，近似蒙古包，反映出蒙古民族的特色。安西王城与此前一年修筑的永昌只必帖木儿王城相比较，后者周长7华里多，也是座北向南，仅有一座南门，东西北三面建墩，供士兵了望观测用。墩是否为半圆形，因基础已被坏，不得而知，但仅有南门以通凉州（武威）似乎也反映了同一特点。从墩的地基看，墩很雄伟，安西王北城墙可能也有此类建筑。

龛殿中峙，大殿在城中央。据勘查记，在城的中央，有一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遗存高出现在地面2—3米多。在台基上散布着大量砖瓦和琉璃瓦，看来是宫殿的基址无疑。台基南北长，东西窄，南北长约185，东西宽约90米，与城的长方形相协调。台基露出地面3米，深入地表下近2米，殿基原来的夯土当在5米左右。台基是用土和瓦砾相间夯筑的，夯土层厚0.08—0.1米左右，然后即铺一层瓦砾，厚0.02—0.03米许，铺得很平整，层层打夯，整个台基就是这样一层夯土一层瓦砾打筑起来的。加瓦砾层的目的，除加强坚固性外，还兼有防潮的作用。这一带地方，马哥孛罗说，“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是诸水汇集之所，不仅泸、沣、渭水会集于此，而且京兆城南秦岭诸峪口流出之水过去都流向京兆城北，在水利灌溉不发达的古代，城北就成了水洼地，许多地名如上水腰（洼）、下水腰（洼）等就是因积水很多而得名。

五十年代中，我们在北郊进行回民历史调查时，就见到这里积水广而多的情况，因此，防水在这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台基增高，加瓦砾层，除增加大殿的宏伟壮观外，确实具有防水防潮目的。

遗址上除灰瓦、黄釉璃璃瓦和石刻建筑装饰品外，没有发现木料和马哥孛罗说的“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大理石来装饰”的建筑遗迹。但我们应相信马哥孛罗所见的事实。这些建筑品大概经过元末明初的破坏，有的毁于战火，有的陆续失散，有的或还埋在地下，因为勘查不是全面发掘，地下的东西可能还不少。

王城墙内与宫殿四周间的建筑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城内只少还有王、后、妃、嫔居住之所，建于宫殿外围。马哥孛罗说：“宫的四周有兵驻防”，当有营房。除此，“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专供王室娱乐观赏。看来，王城以内，除王室成员外，没有其他居民。

综观京兆安西王城，确实是一大宏伟壮丽的建筑。马哥孛罗在一百多字的记述中，用“宫很华丽”，“建筑极佳”，“宫很大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等言辞来赞赏，可说是已经到了极点。王城王宫是奉诏修建的，反映了当时蒙古贵族已经过上了豪华奢侈的生活。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即安西王受封时，原京兆城基本完好，马哥孛罗也说“城实在是大而好看”，而且很繁华，物产极多。安西王宫为什么不利用原京兆城的建筑，而另建新城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镇戍”条记：“世祖之时，海

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关中、六盘山是边徼襟喉，所以命亲王忙哥剌出镇。军队“列大府以屯之”，即在大府旁安营。

马哥孛罗记录了与此有关的情况，云：

> 在这里我应当约略叙述大可汗的军队。我将告诉你们，在契丹和蛮子境里各省同他所有其余领域中，有许多不忠不信的人民，常常喜欢来反抗他们的主人。所以凡有大城市和人口繁盛的省中，必须要一队兵驻守（伯希和译本“设置军队”）。这些军队驻扎在距城四五迈耳的乡村里。这些城市有的连城门或城墙都没有，实在毫无障碍可以阻止兵士进入的自由。每二年大可汗更换这些军队和统帅的军官。因此约束，人民全得安居而不能做一点反叛的运动。除去大可汗常常由省内进款分发他们的薪饷以外，这些兵队依靠他们的牲口为生。牲口数目极多。此外他们又以牛奶带进城去卖（伯希和译本作“羊奶”），在城里买他们所需的用品①。

从上记述可见，在大城市和人口繁盛的地方驻扎军队，是普遍情况，不仅仅是京兆。军队离大城的距离，约为五迈耳的乡村。马哥孛罗笔下的五迈耳，约近五华里（安西王城周，也是五迈耳，约近五华里）。安西王城的兵营地，距京兆城也是五华里左右。

驻扎军队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不忠不信”的反抗者，使人民不能做一点反叛的运动。所以是针对被统治者的，居住的营房要与人民分离开来。这些驻防军，调遣频繁，大约每

① 《马哥孛罗游记》第163页。

二年更换一次，不恒其居，所以永久性建筑不多。“车间容车，帐间容帐”，既是游牧民族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经常调遣，随时准备行动的证明。

这些军队不完全脱离生产，大汗仅供应部分薪饷，部分还要靠自己生产维持生活，特别是带家眷的更是如此。生产的内容是放牧，畜产品不仅供自己生活，以满足对肉食、奶食品的迫切需要，而且还要拿出一部分到城里去卖，买回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大量的牲口，需要广阔的牧场，京兆城东北，包络原野，方四十里的平原，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正为大批牲口提供了极好的牧场。他们把农田毁坏，以满足放牧的需要。

此前修筑的武威永昌只必贴木儿王城，也是这种情况。王城距武威城三十里，城附近河流沼泽众多，水足草肥，供王室军队放牧。阔端王和只必贴木儿王不住凉州（武威）城，而另筑新城居住，他们还经常追随牧群到很远的地方跑马、射猎，其性质与此完全一致。对游牧民族来说，新鲜的奶食、肉食品，是生活极其需要，须臾不可缺少的。

从王城的建筑布局看，王宫，王城是专供蒙古王室成员处理公务、生活居住需用的，而不是王相府办公之所。城内虽有住房，但并不多。赵炳以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后任安西王相，他的府第在京兆城，而不在王城。其余相府官员也是如此。蒙古军队的保密制度极为严格，王府、相府分离，王城另筑，与保密有很大关系。

夏则乐其高寒，即六盘居。这里是从成吉斯汗开始，以后历代大汗用作避暑的地方。忽必烈称汗以前，曾在此三次

居住。除避暑外，“六盘扼秦陇之吭，俯瞰全蜀”①，对“镇西土”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安西王在六盘山的府第，在山北开成。《元史》卷六《地理志》三记：

> 开成州，唐原州。宋为镇戎军。金升镇戎州。元初以为原州。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
>
> 县一，开成。
>
> 州一，广安州。……元至元十年，安西王封守西土，既立开成路，遂改为广安县，募民居止。未几户口繁鞫，十五年升为州，仍隶本路。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固原州条记：

> 开成废县，州西南四十里。……宋置开远堡，属镇戎军。元置开成路及开成县于此，寻降为州。
>
> 广安城，（固原）州东南四十里。旧志云“在开成县东四十五里。宋咸平中，置东山砦，金升为县，隶镇戎州。元至元七年，并入镇原州。寻改置广安县。又升为州，隶开成路。明初仍废为东山寨。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三记：

> 宋咸平元年，置开远堡，后为县。元至元十年升为府。……至治三年降为州，治开成县。明初废州为县。

据上，元安西王六盘山夏宫，治开成，辖开成州、广安州，总称开成路。开成、广安地，唐属原州，宋置镇戎军，金升为镇戎州。宋、金、西夏间不断战争，这里已经荒芜，人

①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口更加稀少。大蒙古国兴起后，因战争需要，这里成为进兵、屯兵的战略要地。安西王封守西土，分兵驻守，遂立开成路，辖二州一县。开成为县、府、州治所，也是王宫所在。

原州高平，地势险要，汉安定郡高平第一城，即筑于此。宋置镇戎军，以防西夏，于其南设开远堡。元改开远堡为开成县。广安县为宋东山砦，金升为县，元改为广安县，至元十五年升为州。开成县在固原西南四十里，今为宁夏固原县西南之开成；广安在固原城东南四十里，今为固原县东南之古城。广安距开城四十五里，三城形成不等边三角形。二城均在六盘山分水岭以东，开成更接近主峰，广安为其东之屏障。固原城历史悠久，城址基础较好，忙哥剌何以不利用固原城，而将宫邸建于开成，原因一是同京兆城外修王城一样，军队不驻大城，而另筑新城，军民分离；二是开成更接近险要地势，当交通枢纽，南下折而东，顺泾河川道，直抵关中；向南经天水，或入蜀，或入吐蕃；西达兰州、河西；西北通宁夏。蒙古军队多次从北而来，经此东至关中，南达川蜀，西至河西、吐蕃，进退自若，战略上具有“镇西土”的作用。

宫邸建筑情况，缺乏史料记载。据《元史·五行志》一和《蒙兀儿史记·安西王忙哥剌传》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壬寅，“开成地震，坏王宫及官民庐舍，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从被压死的人数看，当时的宫邸、房屋，建筑面积也是相当可观的。其宫邸的宏伟，可与安西王城相比照。除房屋宫殿外，军队居住的地方，大概也是“车间容车，帐间容帐”。

另外，《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固原州六盘山条还记：

> 六盘山……上有清暑楼，元安西王所建。

这大概是避署、赏景的建筑。

开成路的另外一座宏伟建筑是延厘寺。寺建于六盘兴庆池园，由安西王阿难答为纪念忽必烈和皇后，于元贞二年（1296）报请成宗批准动工，大德七年（1303）为止，历时八年才竣工的。元成宗为此“加赐黄金，两计者二百五十；楮币，贯计者五万；米，石计若千四百五十”。建筑规模，“一以都城敕建诸寺为师，而小之”，即仿大都（北京）敕建诸寺的形式，规模略小。“土木之工，雕楹绘墉；朱尘绮疏，匹帝之宫”①，与马哥孛罗所见之西安安西王宫油漆绘画，大概不差上下。寺名取华岳之门。揭为宣厘，延至六盘之意，命名曰延厘寺。从延厘寺的建筑，也可以窥探六盘山宫邸建筑的大致情况。

安西王“封守西土”，利用他们的权力，动用大批人力、财力、物力、修筑城池、宫殿、庙宇，夏有夏宫，冬有冬宫，而且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在元世诸王中是仅见的。《延厘寺碑》称：“名王雄藩无有若是吾君之子威仪者”，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些建筑绝大部分是蒙古军大举南下灭宋的重要时间竣工的。当时各族人民不仅承担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而且还为藩王享受付出大量的劳力和财力。

王城和宫殿的建筑，既保留了传统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也反映着蒙古族的传统特色，主要风格还是中原积累起来的建筑技术。这说明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要求接受中原文化，学习和利用中原文化以提高自己生活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这些建筑，既是民族传统文化交流的体现，也是蒙古族与中

① 姚燧《牧庵集》卷十《延厘寺碑》。

原各族民族融合的初步象征。

这些建筑，有的毁于天灾，有的坏于人祸，最后大概于元朝灭亡前后就不存在了。但在当时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五、安西王的官属

蒙古诸王，视印纽为差别。中统三年（1262）封真金为燕王，后赐金印兽纽，是为最尊贵的亲王。至元九年（1272），封忙哥剌为安西王，赐金印螭纽；次年初，真金立为皇太子，立即加封忙哥剌兼秦王，赐金印兽纽，与真金为燕王时印纽相等。忙哥剌一王二印，两府并开，这在诸王中是绝无仅有的。忙哥剌的任务是“镇西土”，“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①，辖区之广，权力之大，也是忽必烈及其以后诸帝所封诸王中不能相比的。为此，安西王忙哥剌的官府、属吏，也比其他诸王庞大、众多。

安西王的官府、属吏，主要分两类：一是王相府及其所属官员，一是王府及其所属官员。王相府兼管军民之政，总揽全局；王府的最高官职是王傅，主要管理王府诸事，一般不干涉地方军政。后来，有的王傅开始向王相转化。

至元四年（1267）八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九月，“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柴祯尚书兼府尉，宁源侍郎兼司马”。次年“命云南王忽哥赤统兵南下……遇有叛乱不庭（?）为边寇者，发兵一同进讨”②。王府已有王相府的作用。不久，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欲谋害忽哥赤，“且赂王相

①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② 《元史》卷六《世祖记》三。

府官无泄其事”①，说明云南王忽哥赤已经设置了王相府。

安西王相府，始设于至元十年（1273）。《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至元十年，“出为安西王相”。又引《墓碑》：“十年，封皇子莽嘎拉木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为王相。上曰：‘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商挺在忽必烈出王秦中时，即被召见。杨惟中宣抚关中时，任郎中。当时，陕西“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挺佐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月，民乃安。”不久，升为宣抚副使②。商挺在秦三年，功绩卓著。忙哥剌出王秦蜀，忽必烈以王年少，把黄河山陕交界迤西的广大领土托付商挺，表示对他高度的信任。

其次是李德辉。蒙哥汗“割京兆隶世祖潜藩，择廷臣能理财赋者俾调军食，立从宜府，以德辉与孛得乃为使。时汪世显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规进取，数万之师，仰哺德辉。乃募民入粟绵竹，散钱币，给盐券为直，陆挽兴元（陕西汉中），水漕嘉陵，未期年而军储充羡，取蜀之本基于此矣。”③“去皇子安西王有土关中之明年，当（至元）十一年，奏求公辅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④这是上任的第二名王相。

第三是赵炳。忽必烈王关中，炳“以勋阀之子，侍世祖于潜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至元九年，帝念关中重地，风俗强悍，思得刚鲠旧臣以临之，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

①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②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③ 《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辉传》。
④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至元）十四年，加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① 赵炳先于安西王到达京兆，而加王相在五年之后，实际上在称王相之前已经履行着王相的职责，在京兆安西王府起着重要作用。

以上三王相，都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先后进入关中，为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效力，并做出一定贡献，得到信任和眷遇的旧属。当忙哥剌出镇"西土"时，忽必烈将他们一一调迁，把辅佐重任托付给他们。王相府的这个主事班子，比起云南王忽哥赤的相府要坚强的多，责任重大得多。

还任命过一名王相，即汪世显的后代汪良臣。汪氏祖孙在蒙古军统一陇右，进取四川，平定阿蓝答儿等人的叛乱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先头入蜀的军队大部分是这批人。至元十五年（1278），"四川悉平，捷闻，世祖甚喜，召（汪）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还未上任），十八年夏，疾卒。"② 汪氏虽未任相府王相，但在安西王忙哥剌在位期间，受安西王承制调遣，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王相是安西王的咨询、顾问、办事大臣，王相府是王府的执行和办事机构。商挺任王相，忙哥剌问治理之道，挺进十策："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厚民生，一事权，

①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② 《元史》卷一五五《汪良臣传》，《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祖显传》附《良臣传》。

请心源，谨自治，固根本，察下情。王为置酒嘉纳。”① 这些都是治国治邦之道，对年幼的安西王具有重要意义。

在三王相中，商挺与忙哥剌的关系最为密切。上引商挺《墓碑》云：商挺为王相初，忽必烈即说：“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至元十四年（1277）冬，“皇子（忙哥剌）北征兀剌孩火石颜，而南平王秃鲁据六盘叛附海都，安西王相府命蒙兀将别速带领兵进讨”②。世祖命挺：“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③ 后来，忙哥剌死，王妃使其请以子阿难答为嗣。忽必烈以“年少”拒绝，命挺“姑行王相府事”④ 由此可见，商挺在三王相中最受忽必烈的信任，重大任务均托付与他。而他经常在王相府署理事务。

李德辉至王相府，“视灞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其中，假牛、种、田具，赋予贫民二千家屯田，最一岁入，得粟、麦石十万，刍稿束十万”⑤。这一措施不仅是为招徕流亡，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当时安西王府初开，王城、宫殿正在修筑之中，大批军民云集，急需粮食、刍草，这一收入，对京兆地区粮草困难的解决，安西王府的巩固，其意义尤为重大。

在为安西王经济创造一定条件之后，于至元十二年（1275），诏以王相抚蜀。当时四川分设东川、西川行枢密院，合兵数万攻重庆，王相至，两枢密府争遣使，咨受兵食方略。李德辉指责两府利其剽杀，玩寇疆场。十四年（1277）“诏以

①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② 《蒙兀儿史记》卷六四《汪世显传》附《惟正传》。
③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④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⑤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不花与公，代为四川副枢，公兼王相。”“大军既发，公留成都，供亿食才支半月，赋粟继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运。其年复沪州。”十五年（1278）克重庆、合州。“川蜀悉平，复以王相还邸”。十七年（1280）奉诏谕罗氏鬼国降，被称为“活合（州）李公”。王相府罢，诏命行陕西省中书事，令未至死于黄平（贵州黄平）①。李德辉在元兵长期围攻重庆、沪州、合州不下，东西川行枢密院互相争权夺利，观望不前的情况下，以王相兼西川副枢，首先保证前线军粮之需要，然后挥军南下，剿抚并使，使南宋守兵节节败退，统一了四川、贵州等地，使安西王兼辖西蜀四川的任务得以实现。

王相赵炳，先以京兆路总管兼府尹为安西王修治城池宫室，兼理王府财政，请王免征欠税，以苏民力，“秦民大悦”。以后加封王相，驻京兆。西平王秃鲁叛于六盘山，炳以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部署兵力，从京兆率兵往捕。“甫及再旬，元恶授首”。次年春复叛，与汪惟正分兵进讨，擒叛将燕只哥，及西平王秃鲁②。安西王忙哥剌死，十六年（1279）奉诏入觐，世祖加封为“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余职如故。”③ 返回时被王妃死党囚闭毒杀。

赵炳任职八年，修建宫邸，两平叛乱，更重要的是清理财政，减轻人民负担，扩大生产，增加王府收入，使京兆成为安西王巩固的战略根据地，保证了“镇西土”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需要。元世祖后加封“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

①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②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卷一五五《汪惟正传》。
③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屯田事”，也正是看中了他理财的才能。

安西王忙哥剌在位七年，正是西土多事之秋，西北不断有诸王的叛乱，东南担负着灭宋的重大战争，任务十分艰巨。但是由于忽必烈为忙哥剌选择了三名王相，置王相府，佐王以镇“西土”。王相府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不仅数次平定叛乱，取得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胜利，而且在经济上增加收入，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马哥孛罗对京兆大城的繁荣景象的纪述，前面已经引过。接着他说，汉中地区“沿途有客栈，旅行人可以安逸居住”。白城子“生姜在这里出产很多，贩运至契丹大省各处出卖，因之居民由此物获得大利益。又产大麦、米和别种谷类，皆极多，价钱很廉。这地实在是各种好东西皆丰富的。”成都平原，“江上航运甚盛，我意在讲船艘非常之多。其数目之大，没有看见的人是绝不相信的。江面商人载运货物上下，其数之多，没有看见的人，是绝不相信的。”成都城“桥上也有大可汗的税收关，关吏管理征收在桥上卖出货物的过境税……每天桥上收得的过境税值一千金贝桑忒。”①以上记述，点点滴滴反映了安西王辖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这些成就的取得，王相府起了重要作用。至元十六年，忽必烈召王相赵炳入见，慰劳说：“卿去数载，衰白若此，关中事烦可知已！”② 仅此数语，即可说明工作之繁重、劳神。

在忙哥剌时期，安西王统辖秦、陇、河西、四川、吐蕃等地，主要是“承制”通过下属官员来进行的，其中主要是王相府。王相府的王相一般担任军、政、财、法等职务，对

① 《马哥孛罗游记》第226—229页。
②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所属地区可“承制”行事。郡牧、藩王有时也要接受王相的命令，因为王相府是安西王的办事机构，安西王又是大汗派出统辖“西土”的最高首领，所以王相的决定，代表大汗的意志。

至元十五年（1278）底，忙哥剌死，世祖忽必烈本想继续保留王府、王相府、命商挺“姑行王相府事，以俟”①。但是，第二年发生了王相赵炳因向世祖揭发运使郭琮等人“窃弄威柄，恣为不法”② 的罪行，事连王妃，王妃命囚之于六盘崆峒山狱，暗杀。赵炳之死，又涉及王相商挺，商挺也被囚之于狱。在这种情况下，王相府失去王相，而李德辉又在川贵。世祖已经发现王府、相府内部存在很多问题，加上当时战事已基本结束，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统一全国，遂于十七年（1230）下令罢王相府，而仅留王府管辖他的领地，同时也就结束了安西王兼辖陕西五路西蜀四川河西吐蕃等处的历史使命。同年，恢复陕西四川行省，以前任王相府右丞伯不花开省京兆③，李德辉、汪惟正任左丞。十一月二十七日，李德辉病死。以后，伯不花任平章政事，汪惟正为左右丞。行省的设立，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安西王府仅领有京兆安西王城和六盘开成路等地。

阿难答嗣位后，一再奏请恢复安西王相府，并保留着王相府印。至元二十年（1283）诏令：“定拟安西王相府首令官、令史与台院吏属，一体迁转”④，意思是王相府原设的右丞伯

①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注引平陵周公撰墓志。
②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③ 姚燧《河南道劝农副使白公墓碣铭》，《元文类》卷五五。
④ 《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

不花调任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后，其下属各级官员，应一并转入行省调迁。然而，嗣王阿难答继续保留王相府印，仍奏请设王相府。二十四年（1287）十月，中书丞相桑哥奏："北安王相府无印，而安西王相独有印，实非事例，乞收之。"十一月又奏："先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统河西、吐蕃、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印。今嗣王阿难答仍袭安西王印，弟按摊不花别用秦王印，其下复以王傅印行，一藩二主，恐于制非宜。"世祖在桑哥的一再奏请下，"诏以阿难答嗣为安西王，仍置王傅，而上秦王印。按摊不花所署王傅，罢之。"① 至此，安西王一王二印和王相府印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收缴秦王印和相府印，保留了安西王印和王傅印。按摊不花私设的断事官和秦王府典藏司也一并裁撤，仅给安西王阿难答王府断事官印。忽必烈为了缓和同侄孙阿难答的关系，立即从其所请，安西王下"设本位诸匠总管府"②，断事官仅"理王府词讼之事"③，王府与地方军政完全分离。

阿难答对此始终不满意，继续向世祖奏请要求设置常侍官，增加王府官职，但是均遭拒绝。直至忽必烈死前数月，才答应阿难答，令铁赤、脱脱木儿、咬住、拜延等四人，并为安西王傅④，但不设王相。

元成宗即位初，阿难答又提出设王相府之事。元贞元年（1295）二月，"安西王相（此处应为傅——引者）铁赤等复

① 以上所引均见《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
②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
③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④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请立王相府。不许。"[①] 次年正月，铁赤、脱脱木而等又向成宗提出设立王相府的要求。元成宗立即加以驳斥，云："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联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今姑从汝请，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②] 这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王傅换成王相府，仍只管王府事。

从元成宗的这段驳辞中，我们可以看出阿难答一再要求恢复王相府的目的，和世祖、成宗再三拒绝恢复的原因。成宗"以世祖定制谕之"，只是空话，托词而已，而直接原因双方都很清楚，在进行着权利之争。

在忙哥剌时期，安西王有领地和辖区，对领地和辖区内的政治、军事、财政、税收等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而忙哥剌在位时，税收、赋役、军事调遣，后勤供应等都"承制"由王相府办理，王相府具有很大权力，为忽必烈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至元十四年（1277）元改京兆路为安西路、京兆路总管府为安西路总管府，将金京兆府八十二县为安西路总管府五州十一县，降原恒州为周至县，鄜州为鄜县，桢州为韩城县，并栎阳入临潼县，云阳入泾阳县，下邽（读吉，不读圭）为渭南县，美原入富平县，好畤入礼泉县[③]，一是使安西王与安西路总管府名称相一致，二是为了加强管辖。罢王相府后，阿难答嗣王位，与此同时设置了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路州县归行省，阿

①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②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③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一，第21页，中华书局，1990年。

难答仅仅继承了长安的安西王府第和开成路二州一县，权力大大削弱了。阿难答一再要求设立王相府，目的是要恢复忙哥剌时期的权势；而世祖，成宗拒绝，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王的势力，以巩固皇朝。

阿难答力争没有达到目的，便采取别的办法，一是不断向朝廷告苦，要求物力财力的救济，这在后面专门研究；二是不断扩大地盘，强占居民。元成宗大德五年（1307）七月，"籍安西王所侵占田、站等四百余户为民"①，就是针对其扩张行动所采取的措施。察罕脑儿（内蒙古托克托西南）虽是安西王辖境，忙哥剌很少到那里去，而阿难答多次至此驻扎，实际上此时该地已属中书省。又"安西（王）旧有牧地，圉人恃势，冒夺民田十余万顷，讼于有司，积年不能理。制宜奉诏而往，按图籍以正之。"② 阿难答所部强占民田，已经发展到地方政权无法解决，需要奏请皇帝，由朝廷派人来解决的地步。

王相以下，有左右丞。至元十七年（1230）诏罢王相府，以原任王相府右丞伯不花开省京兆，为陕西四川行省的最高长官，位在李德辉、汪惟正之上。这一方面是因行省最高长官需要由蒙古人担任，同时也反映王相府左右丞在相府中有很高的地位。与伯不花同时由王相府转迁行省的有"首令官、令史与台院吏属"，是原王相府的属官，王相府原来有一套庞大的官僚组织。

安西王府还有专门负责制造、储存、发放武器的机构，以供应安西王辖区的军事需要。原来秦陇诸路军队中就有一大

①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② 《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附子《制宜传》。

批工匠，制造各种武器装备，成品归安西王武库使保管。忙哥剌即位不久，以仇锷为“武备寺寿武库使”①，武库使为武备寺的下属官府机构。当时安西王负担平定西北诸王叛乱，南下进攻南宋的任务，每年派兵、签军，这些兵力的装备大部分由安西王武备寺制造、供应。武备寺当时属王相府管辖。罢王相府后，武备寺归行省。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巩昌路帅汪惟和等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② 此“官库”即指陕西四川行省所辖的武库。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证明武库转归地方的情况。《元史·成宗纪》一，元贞元年（1295）十一月条记：“赐安西王（阿难答）甲胄、枪挝、弓矢、橐鞬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说明阿难答的军事装备由朝廷直接拨发，本身已经没有制造、保存武备的专门机构了。

前引《元史·成宗纪》元成宗在阿难答再三要求设置王相府事时，说“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不能归藩王。在忙哥剌时期，对辖区的赋税、军站，均归安西王承制统辖。如前所述，王相赵炳、李德辉等对赋税的征收、调运、军站的储存、供应、有绝对的指挥权。运使承担从产地到使用地的运输任务，其中包括盐运。《故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德举）神道碑》记：“安西王国秦，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③ 运使、转运使所属官吏遍布安西王辖区各地。

运使系统应归王相府管理，其官职有同知、郎中令等。但

① 赵孟頫《福建廉访副使仇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六。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③ 《元文类》卷六四。

是，由于运使司直接掌握物资、财产，而且在转运过程中大量营私，利用特权谋取暴利，从而发展到与王室勾结，咨为不法的严重局面。发生在至元十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由运使造成的。

安西王相赵炳入朝奏事，世祖问及安西王府情况，“赵炳言：‘陕西运司郭同知、王相府郎中令郭叔云，盗用官钱。’敕尚书秃速忽、侍御史郭祐检核之。”① 赵炳等返回京兆，“（郭）琮假嗣王（阿难答）旨，入炳罪，收炳妻孥囚之。”“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平凉狱中。”② “朝廷疑擅杀之，执琮、叔云鞫问……王府女奚彻彻以预二郭谋，临刑，望以求生，始有暧昧语，连（商）挺及其子瑱。帝怒，召挺。”③ 商挺被捕入狱，从此一蹶不振。

赵炳、商挺是多年跟随忽必烈，深受重用的官员，而且不断寄以厚望，甚至把安西王辖区的大事全部委托，但最后却死于、败于运使同知郭琮等人之手，从而使安西王府由它发展的项峰衰败下来。运使同知等人的这些不法活动，又与王妃等人相勾结。运使掌握大批钱物，贿通王府中的好利之徒，恣为不法。王相赵炳不能解决，诉之世祖，在诏令核检中，赵炳惨遭杀害，商挺受牵连入狱。从这件事情的本身一方面反映出安西王忙哥剌及其妃在拥有极大权力的情况下，仍不满足，继续贪得无厌，谋取私利；另一方面说明，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运使仅仅是王相府下的一种职能机关，但因掌握着相当大的财权，因而能与王府勾结，擅杀王相。所

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②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③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以，忽必烈在此事发生后，追查不放，直至罢王相府，权力统一于中央，也是看出其中的许多的弊病，而采取的果断措施。

六、安西王府的军队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军队，地位最高的也是军队。军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大蒙古国时期，军事权力一直掌握在大汗、大汗子弟和少数勋贵的手里。军队的人数、装备、部署、调遣等只有大汗知道，少数子弟勋亲知道，别人不能问津。成吉斯汗死后，窝阔台根据遗诏，继承了汗位，然而四子拖雷掌握着很大一部分兵权。最后，其子蒙哥夺取政权，继承大汗，窝阔台的子孙们被分割瓦解，势力衰败。

忽必烈即汗位后，实行军民分治，“管民官理民事，管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①，民事归中书省（有时设尚书省），军事归枢密院。枢密院“掌天下兵军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② 遇有征伐之事，则分设行枢密院于地方，由枢密院派遣官员，专司一行省、一地方之军事，事毕即罢。中统二年（1261）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次年，“兼判枢密院事”③，使军事权力更加集中。

当时的军队，大致可分两大部分，一是保卫皇室的卫戍部队，二是镇守地方的镇戍军。这两大部分军队中，其成分

①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②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
③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皇太子真金传》。

又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后来编入的新附军四类。宿卫部队地位最重要，由四类中选调，镇戍军则分散在全国各地。忽必烈称汗后，将诸管军万户分别调遣，有的宿卫京师，有的分驻各地，形成了宿卫和镇戍两大部分的初步格局。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根本改变蒙古军制混乱的状况。由于“分隶频碎，源委隔绝，棼丝沸鬻，互相争夺，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①，加上严密的军事机密制度，因而弄清军队人数，特别是镇戍诸王的军队人数，是极为困难的。

忽必烈众建子弟，以藩王室，都给予王室一定的兵权。至元三年（1266）六月，封皇子那木罕（《元史》作南木合）为北平王，开藩王镇边之例。因“时诸王海都跋扈金山（阿尔泰山），连结西道宗王，抗违朝命。忽必烈汗谋以亲藩帅重兵防之，意属王。七年（1270），赐王军马六千匹，牛三千头，羊一万（此据《元史·世祖本纪》）。八年（1271）出镇西北边，建牙于阿力麻里克（新疆霍城）。”②

四年（1267），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次年，“命云南王统兵南下，……遇有叛乱不庭为边寇者，发兵一同讨捕。降服者，善为抚绥。”③

忙哥剌受封安西王，也有军队。《元史·世祖本纪》记：

> 九年（1272），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

这支军队是忙哥剌以亲王镇京兆时已有的，还是封王时所赐，

---

① 胡祗遹《紫山集》卷二二《军政》。
②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北平王那王罕传》。
③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云南王忽哥赤传》。

无法弄清。但是，出任安西王时，他已经掌握着一支由他直接指挥的军队，并规定了防地。从驻防地区来看，这支军队人数不会很多，容量不会超过万人。其性质，“时平则列置监牧，攻驹而蕃息之；有警则命将出御，无有常制”①，这大致是骑兵。又云：“世祖渊龙之加兵大理也，既尝玛牙干兹；及平而归，又饮至焉。”“而王父子，再世受之”②。这曾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带领过的一部分军队，以后又封给安西王忙哥剌。

京兆安西王城周围驻兵的情况，是“龛殿中峙，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包原络野，周四十里”③。结合前引《马哥孛罗游记》所载，这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镇压反抗蒙古统治者的人民，保卫王城的安全。这类军队大都携带眷属，不脱离畜牧业生产，虽然分布范围方圆有四十里，而兵士人数大约只有数千。这两处兵士合起来，总共约有万余人，同封地一样，这是他直接指挥的军队。

除这批军队外，安西王忙哥剌“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④，陕西、四川、甘肃、吐蕃等处的军队，均受他兼管。忽必烈即位前夕，廉希宪向忽必烈报告秦陇地区的军事状况云：

> 刘太平、霍鲁海复至陕西，浑都海骑兵四万，大驻六盘，征南之师，散屯秦蜀⑤。

忽必烈派廉希宪等急赴陕西，粉碎阿蓝答儿、浑都海等的叛乱，余众部分西走河西，部分归中书右丞行秦蜀事廉希宪。后

---

① 姚燧《延厘寺碑》。
② 姚燧《延厘寺碑》。
③ 姚燧《延厘寺碑》。
④《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⑤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来，廉希宪内调，征南之帅，大部分进入四川。至元元年（1264）八月，四川已有成都行枢密院①。

为了从蜀道伐宋，除已进入四川的诸军以外，诏令各路陆续签兵入蜀。《元史》卷九八《兵志》记：

> （至元）四年正月，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二月，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户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于系官、投下民户、运司户、人匠、打捕鹰房、金银铁冶、丹粉锡碌等，不以是何户计，验酌中户内丁多堪当人户，签军二千人，定立百户、牌子头，前赴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所辖东川出征。复于京兆、延安两路签军一千人，如平阳、太原例。

《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 七月，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

向东川出征，为后来东川行枢密院的设立创造了条件。修山路、桥梁、栈道，为大军行军和供应军需开辟道路。这些部队和民夫，大部分是从陕西五路和相邻的晋南、晋中调遣的。

至元五年（1268），以南京宣慰（抚）刘整调四川，立东西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指挥诸路军。七年（1270年）“陕西签省也速带儿、严忠范与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及宋兵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② 八年（1271）九月，“罢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以也速答（带）儿行四川尚

①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书事于兴元（汉中），京兆等路直隶尚书省。”①九年（1272），“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蕃军，同征建都（四川西昌）。”② 各路大军云集四川，需要集中统一指挥，因此，诏以忙哥剌为安西王，兼辖陕西、河西、吐蕃、四川军民之政，就是将这些地区的军民集中在安西王统一的指挥之下。

此前进入四川的诸路军，仅有少数列具数目，大部分数字不详。安西王受封后，仍在继续调进。至元十年（1273）正月．“四川省言：‘宋督万寿攻成都，也速带儿所部骑兵征建都（四川西昌）未还，拟于京兆等路签新军六千为授。’从之。”“东川统军……合剌请于渠江之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虎头山立二戍，以其图来上，仍乞益兵二万。诏给京兆新签军五千益之。”三月，“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四月，“罢四川行省，以巩昌二十四处便宜总帅汪良臣行西川行枢密院，东川……等路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签行枢密院事。”十一年（1274），以建都降，命“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戍建都”③。忙古带原领十八族同攻建都，留守时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十八族兵，这是唯一详知兵数的一支兵力。

四川是三道伐宋的西道，虽设东、西川两行枢密院，但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③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是，“行军之事，皆禀安西王节度”① 至元十二年（1275）诏以李德辉为安西王相抚蜀。但由于东西川二院相争不下，东川行枢密院事合剌按兵不动，十四年（1277），以李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仍兼王相，督军伐宋，加强了安西王府对东、西川伐宋军的领导，“省东川行枢密院及成都经略司，以其事入西川行院”② 所以，当元军攻下万州（四川万县）后，《元史·世祖本纪》迳称“安西王所部克万州”。十五年（1278），四川战事结束，捷报由安西王相府上奏：“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四川渠县东）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③可见，安西王府兼辖四川军民之政，是通过王相具体实现，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总计忙哥剌任安西王时统辖的四川诸路兵，有原西川行枢密院事汪良臣所属巩昌兵约一两万人；陕西签省也速带儿带入四川兵万余人；至元四年签平阳、太原兵二千人，京兆、延安签军一千人；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民兵一千人；西平王奥鲁赤兵数千人；南平王秃鲁数千人（后退居六盘山）；忙古带留守建都兵一万一千五百人；至元十年两次从京兆签兵一万一千人；总计约为六七万人之数。刘整由南京（开封）调至四川，任东西川统军事都元帅，所带兵士不多；后于兴元（陕西汉中）教练水军五六万，实际未达到此数，而且也未进入四川。加上其他诸路军，总数当在十万以下。

再从战后的善后工作看，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鸭池（贵州修文西北）等处招讨使钦察所领南征新军，不能

①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② 《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③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自赡者千人，命屯田于京兆”①。这支兵力可能是至元七年以后从京兆等地签发的。十六年（1279）“敕发西川蒙古军七千，新附军三千，付皇子安西王”②。忙哥剌已死，而退还安西王相府的兵力仅万余人。这虽不是全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可以反映战前四川兵力的一些情况。

至元十四年（1277），四川军事正在紧张的时候，京兆路兵力空虚。为了防备万一，王相商挺提出：“延安民兵数千，宜使李忽兰吉练习之，以备不虞。”安西王“承制授（其为）延安路管军招讨使。”“十五年，秃（土）鲁叛于六盘，忽兰吉以延安路军会别速台、赵炳及总帅府兵于六盘，败秃鲁于武川，俘其孥。还，承制授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③《赵炳传》亦记有“王师北伐，六盘守者构乱，炳自京兆率兵往捕”之事。这支兵力主要指李忽兰吉所部。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博罗欢）神道碑》记：忙兀于至元十八年（1281）“以右丞行省甘肃。时大军驻西北，仰哺省者十数万人。自陕西、陇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车辇而畜负之。”④ 这时，安西王相府已罢，而驻西北的大军，包括各种需要供应的军事人员，为十数万人。可见，安西王兼辖的军队，总数仍为十几万人。为了减少供应负担，战后将大批军队转向屯田。

屯田军是安西王忙哥剌时期王相府兵力的又一组成部分。

---

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②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卷九九《兵志》二。
③ 《元史》卷一六二《李忽兰吉传》。
④ 姚燧《牧庵集》卷十。

陕西屯田军始于蒙哥大汗时期。三年（1253）忽必烈得京兆分地，遂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中统元年（1260），遣灵州（宁夏灵武）种田民还京兆。这是京兆居民被迁往灵州屯田的民户，此时因京兆人口稀少，复还原籍。当时屯田的目的，忽必烈在中统二年（1261）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山西临汾）兵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① 不久又划归京兆，仍隶兵籍。四年（1263）正月，"以宋忽儿、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至元元年（1264）八月，"陕西猎户移猎商州，河西、凤翔（部分）屯田军迁戍兴元。""发万户石抹 纠札剌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②

安西王忙哥剌开府京兆后，上述京兆路屯田归安西王府，并继续扩大屯田。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二千户，立栎阳、泾阳、终南、渭南屯田。"③ 同年，李德辉出任安西王相，"至则视灞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其中，假牛种、田具，赋予贫民二千家屯田。最一岁入，得粟石十万，刍货稾束百万。"④ 这批粮草安西王忙哥剌开创业迹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延安路、开成路也开办屯田，以供军需。开成路设屯田总管府。这些屯田，都归安西王府管辖，为其军事行动提供粮草。

至元十七年（1280）罢安西王相府后，屯田进入新高潮。但是，屯田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后开办的屯田，大部分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④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是为了安置原安西王所辖部队和军务人员，通过屯田，隶属关系由安西王府转入地方。但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安西王府原来兵力的一些情况。

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忽必烈“命安西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于安西（京兆）、延安、凤翔、六盘等处屯田。”①在此诏令下，屯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十九年（1282），“以军站屯户拘收为怯怜口户计，放还而无所归者，籍为屯户，立安西（京兆）、平凉屯田。”“立凤翔、镇原、彭原屯田，放罢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的）延安军人，置立民屯，……寻改为军屯。”②以上为户7344。后归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立的陕西屯田总管府。

同年二月，“以周至南系官荒地，发归附军立孝子林、张马村军屯。次年，“以南山把口子巡哨军人八百户，于周至县之杏园庄，宁州之大昌原屯田。”二十一年（1284），发文州镇戍新附军九百人，立（眉县）亚柏镇军屯”③。以上为户3120，归陕西等处万户府。

同年，“以拘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为田四百八十六顷。”④归贵赤延安总管府。

二十一年（1284）二月，“以别速带（儿）逃军七百余人，付安西王屯田，给以牛具。”⑤此安西王指阿难答，仅七百人。

二十四年（1287），“从总帅汪惟和言，分所部四川军五

---

①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②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③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⑤ 《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千人屯田六盘。"①

经过遣散军队举办屯田，陕西行省屯户大为增加。至元二十七年（1290），朝廷"遣兵部侍郎靳荣等阅实安西、凤翔、延安三道军户，元（原）籍四千外，复得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枢密院欲以为兵，桑哥不可，从之。"②此新增户不是有计划安排的，而是安西王权力削减之后，各路军流散去无归向者，不得不依附于屯田，使屯户猛增至七倍多。在这种情况下，陕西设立安西、延安、凤翔三路屯田总官府，管理屯田。

这次举办屯田，同阿难答嗣位，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从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史载共安置屯田的兵士约为一万八千余人，其中有的带家眷，以户计。后来又从安西、凤翔、延安三道查出私增的屯丁为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共计五万余丁。这样，安西王原来兼辖的军队近一半即转为屯户。除此之外，四川、吐蕃留有戍军；礼文州（甘肃礼县）军隶陕西行省；巩昌汪氏所领的兵撤出四川后部分在巩昌二十四城，有的调遣河西，与安西王府脱离。除去这些，阿难答所有的兵力仅有京兆安西王城和六盘开城王城驻守的亲军，加上山后还有一部分不脱离生产的民户，总丁数充其量大约万余人。

六盘山地区的屯军，至元十九年（1282）诏令从中调遣七百七十人，赴新疆和田，"以补（斡端宣慰使）刘恩之军"③次年，将开成路屯田从安西王府属下分出，隶京兆宣慰司管辖④。原安西王的屯田军又在削减。

---

①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
②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③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④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经过大量裁减，安西王阿难答的军队不仅数量减少，而且生活日益困难。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二月，“安西王阿难答来告，士兵饥，且阙橐驼”① 至元三十年（1293），六月“敕选河西质子军精锐者八百（人），给以铠仗、鞍勒，狐貉衣裘，遣赴皇孙阿难答所出征。”十月，“以侍卫亲军千户张邦瑞为万户，佩虎符，将六盘山军千人及皇子西平王军共为万人，西征。”② 这两条说的是一事，河西质子军八百人去支援阿难答，阿难答能从六盘山调出的军队仅仅是千人，亦可反映阿难答兵力的薄弱。

元成宗即位初，元贞元年（1295）六月，“安西王所部出征军妻孥乏食，给粮二千石”。“十一月，赐安西王甲胄、枪挞、弓矢、橐鞬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③ 这看起来数目字很大，实际上每个骑兵装备就需要数十件。大德五年秋，“海都犯和林，王所部力战有功。至冬解严，给其军士食，令还各家休息。”④从大德七年五月论功行赏的情况看，“北师银二十万两，钞二十万锭，币帛各五万九千匹”，而阿难答仅得金五十两⑤，也反映出参加人数之少，战功很不显著。

忙哥剌死后，忽必烈对安西王采取的削藩政策是成功的。阿难答虽然继承了安西王位，而他所拥的力量已经远远不能和忙哥剌在位时相比。这与阔端王死后只必帖木儿继承王位的状况大致近似。可以估计，他所属军队，约为忙哥剌时期的十分之一。

---

①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②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③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④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安西王忙哥剌传》。
⑤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最后，专门研究一下安西王忙哥剌辖区的探马赤军问题。

探马赤军，是蒙古兵种之一，始设于成吉斯汗时代。《圣武亲征录》："戊寅（1218）年，封木华黎为国王，南伐金国。"分探马赤为五部，各置将一人。"①此五部为弘吉剌、兀鲁台、忙兀台、札剌儿和亦乞烈思。五部虽是成吉斯汗早期统一起来的部落，但因不是成吉斯汗所在的蒙古部，故有"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②之说。实际上，其中不乏蒙古人。探马赤军是从军队中挑选勇健者充任，进军时担负前哨、冲锋陷阵之责，所以后来广为发展，用于扈从、镇戍等各个方面。

成吉斯汗西征，探马赤军制也推行于中亚。拉施特《史集》记：成吉斯汗去世，也可、哲别等到伊朗，取道铁门关回师，来到窝阔台合罕处拜见了他。窝阔台任命绰儿马浑为四万军队的列失格儿探马，派赴我方〔伊朗〕。余大钧等译注："列失格儿为波斯语军队的意思，列失格儿探马，即探马军。此句据波斯原文应译作'窝阔台将四万军队的探马军委派给绰尔马浑'。"其军事编制有千夫长、万夫长等。绰儿马浑死后，"另一万夫长为灭里沙，当时征集了一支由畏兀儿人、哈剌鲁人、突厥蛮人、可失哈尔人和苦叉人组成的军队交给他〔统率〕。"③可见，探马赤军中畏兀儿、哈剌鲁（葛逻禄）、突厥人、喀什噶尔人、库车人中间也有被征集进去的。

既然这些民族中有人参加了探马赤军，当成吉斯汗西征军东返时，被裹胁东来的中亚各族军人中，就有中亚各族的

---

① 《元史》卷一二三《阔阔不花传》。
②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③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等汉译本第159—161页并注②，商务印书馆，1986年。

探马赤军。成吉斯汗军途经河西，包围西夏，进驻六盘山，所领各种部落也在六盘以西至河西地区屯驻下来。后来，大军向秦陇川蜀推进，所属探马赤军也跟着东来。从后来诸王出伯（术伯）和阿只吉所领探马赤军[1]的来源看，与此有极大关系。

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石高山“入见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即命与诸路同招集之。[2]”这指本华黎原领的探马赤军，忽必烈因石高山的奏请，重新派人招集。

同年，忽必烈“以五投下探马赤立蒙古探马赤总管府”，“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心腹，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3] 京兆毗邻河洛，位于心腹之地，加上西域色目诸军东来，西北为早期驻屯之所，其中有不少加入探马赤军者，所以探马赤军在西北特别是陕西五路分布的，自然不少。

探马赤军是蒙古军种之一，以其富有战斗力，冲锋陷阵，向为蒙古统治者所重视。《元史·兵志》记载蒙古军队的情况云：

> 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

---

①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术伯探马赤军有二千人；卷十八《成宗纪》一：出伯探马赤军千人隶西平王。阿只吉探马赤军参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卷九九《兵志》二。

② 《元史》卷一一六《石高山传》

③ 《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

这里仅指出四种，另外还有新附军。渐丁军实际应包括在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之下。

探马赤军的形成晚于蒙古军，而且其成分又非“皆国人”，地位仅次于蒙古军。探马赤军的组织和任务略同蒙古军，家有丁男，无众寡尽签为兵，即编入军户，有一定的组织；有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是一种常备而不脱离生产的军队。

西北地区探马赤军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大蒙古国原有的探马赤军，早在成吉斯汗西征时，归木华黎统率，攻掠中原，后进入西北地区的；二是成吉斯汗西征中新发展起来的探马赤军，后陆续进入西北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此西征中新发展起来的探马赤军，与同时带入中原的诸色目人军队，不是一个概念，诸色目人包括探马赤军的一部分，探马赤军中有诸色目人，但探马赤军包括不了诸色目人，诸色目人也包括不了探马赤军。那种把诸色目人组成的军队与探马赤军混为一谈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忽必烈前期，探马赤军主要仍指原大漠南下的探马赤五部，色目军队加入者居次要地位。《元史·百官志》五：中统三年（1262）”世祖以五投下探马赤立总管府”，此仍指原来的探马赤军。而《元史·兵志》一记：至元十年（1273）正月，诏“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此诸色人户与探马赤军户分界甚明。当然，三路诸色人户，族籍成分十分复杂，宗教信仰各不相同，总数有六万户，推知约三

十万人，人口是相当可观的。

至元九年（1272）正月，“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七月，“阅大都、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① 此在安西王忙哥剌受封前数月，京兆探马赤军已经列入忽必烈登记军户的重要议事日程。次年，诏“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村社），与编民等”②，开始把游动不定的探马赤军固定在村社的土地上，依附于农业生产，承担赋役。此前数月，即至元十年正月，曾诏令“签陕西探马赤军”③，陕西探马赤军已成为签军的重要对象。忙哥剌出任安西王初的数年间，多次签兵入蜀，其中就包括探马赤军，可见探马赤军是安西王忙哥剌所辖兵种之一，数字不详。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诏张珪“持节川陕，民之疾苦，便宜振（赈）之。如罢官府之冗无益于民者，赎探马之贫而典鬻妻子者，还巩昌之民复佥为军者”④。其中之探马赤军，原来也是安西王辖区的军队，此时因长期不签，但已经落到贫而典鬻妻子的地步，而被朝廷赎还。这些探马赤军人，虽在川陕，但已经脱离了安西王阿难答，归属行者。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九八《兵志》一。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③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④ 虞集《平章政事张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三。

七、安西王府的经济收入

安西王府的经济收入，包括王相府和王府收入两大部分。这里说的主要是忙哥剌在位时的经济收入。阿难答即位后，经济收入锐减，与前者相差甚远。至治三年（1320）月鲁贴木儿受封安西王，情况更与以前不能相比，仅仅是王号的延续而已，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们研究安西王府的经济收入，仅仅指忙哥剌在位七年间的情况，不能以此概括整个设立安西王时期的全貌。

从忙哥剌时开始，安西王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位下或投下户

早在成吉斯汗时代，对从战争中获得的土地、财产和人民，要在黄金家族成员和勋臣中进行分配，各得一份，称“份子”，蒙古语称“忽必”。以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占领区的增加，这种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元史·食货志》三《岁赐篇》记：“自昔帝王于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亲亲之义也。元之为制，其又厚之至者欤。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与之。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食采分地，是宗王、后妃、公主基本的“忽必”收入，办法是由皇帝赐封，

封地所在的路府州县派人监督、征收，然后依制分送封主。

忙哥剌所得的食邑分地，在上引篇文中有记载，云：

>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岁赐，段一千匹，绢一千匹。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分拨吉州路六万五千户，计钞二千六百锭。

这个数字和北安王那木罕位下的数字，完全一致。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底，而所得吉州路六万五千户的江南户钞为至元十八年所赐。这种情况，如北安王那木罕至元三年受封北平王，二十三年（1286）"赐食临江路六万五千户"①；云南王忽哥赤于至元四年八月受封，六、七年间被宝合丁毒死，皇庆元年（1312）始得江南户钞福州路福安县食邑一万三千六百四户的情况一样。封王时，忽必烈尚未统一江南。及平江南，又各益的民户，实际受益者或为本人，或为本人位下。就忙哥剌位下而言，受益者是继承人阿难答。

位下分地分户，按照规定，只设达鲁花赤监领，赋税皆输之有司之府，封王不得擅自派人征收。"但是由于它是基于分土分民原则下的折中办法，在蒙古贵族的传统观念中，总是顽固地把分地分民视为自己的私产，尽可能地加以横征暴敛。……诸王、投下往往径自设官征赋，或不断派遣使者到分地督索，凡有所需物色，皆科敛本管民户；并经常擅自招收户计，任意拘刷工匠。"② 这虽说的是一般现象，对安西王位下来说，也不例外。

2，课差

窝阔台汗七年（乙未，1235），开始诏令登记户口，后称

① 《蒙兀儿史记》卷七六《北安王那木罕传》。
②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223页，1986年人民出版社。

乙未占籍。八年（丙申）初定赋税制度，称丙申税制，赋税开始在北方蒙古占领地区逐渐推行开来。后来，将丁税、地税、丝料、商税，加上包银等各种课赋，通称“差发”，向汉地征收。

蒙哥汗即位，赐忽必烈分地，令于南京（汴梁）、关中自择其一。忽必烈听姚枢言，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愿有关中。至则置宣抚司，教使劝农，阡陌连接，收入大增。阿蓝答儿等见关陇大治，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大为不满，奏之于蒙哥汗，汗命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忽必烈）为代偿之”① 可见在蒙哥汗初年，陕西地区已经建立起征收赋税制度。至元元年，全面征收。

忙哥剌受封安西王，以京兆、六盘为分地，时赵炳任京兆路总管兼府尹，即归安西王府下，岁入归安西王府。至元十六年，王相府赵炳奏：“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诏命炳总之②。至十八年，奏“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以为未实，欲骤之。”③ 这虽是忙哥剌死后的数字，但仍反映着忙哥剌时的情况，主持经办者仍是王相赵炳。两年内赋税猛三万五千锭，大大超过原估计数字，一方面反映了加大征收量，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在战争期间，赋税征收，各地因战争需要，截留分散使用，并未悉入王府，战后统归于王府。赵炳尽心措办，即针对这种混乱现象而言。

---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③ 《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

除京兆诸路外，安西王忙哥剌辖区还包括四川、河西、吐蕃等地，这些地方同样也征收课差。

汉水流域原属利州东路。贵由汗在位时，夹谷带（龙古带）行省兴元（陕西汉中），垦田数千顷，“收皆亩钟，敖庾盈衍”，“征蜀之师，朝至而夕廪焉”①。夹谷带于至元壬申（九年，1272）死于兴元私第，正忙哥剌出任安西王前夕。死后，兴元归安西王所辖，其供应四川军需任务，继续进行。李德辉以王相进军四川，通过水路陆路，把大批粮饷运至前线，保证伐宋的战争。这些粮饷多出自兴元、四川等地，总数虽无法统计，但从十余万军队的需要来看，数额是相当可观的。

陇以西至河西、吐蕃地区，前引《延厘寺》记：“诸侯王、郡牧、蕃首……靡不舆金，筐帛、效马、献琛，辐辏庭下。”这里除当应承担的课差以外，还包括其它大量的额外负担。

“丝银”不仅限于江南，陕西等路也在征收。马哥孛罗途经京兆、成都等地，见有大量丝绸锦锻工业生产。至元十二年八月，诏“免陕西等路今岁丝银”②。可见陕西各路也承担丝银税。这些收入，也都归入安西王府。

3，盐课

《元史·食货志》二载：“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若盐。”可见，盐税在元朝经济中所占的地位。

“安西王国秦，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地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入王府。”③《元史·赵炳传》亦记：“有旨，以解州盐赋，给王府经费。”

---

① 姚燧《牧庵集》卷《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
②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③ 姚燧《牧庵集》卷十八《故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

河东解州盐池，池方一百二十里，盛产食盐。《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盐法》篇记：窝阔台汗庚寅（二年，1230），始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每盐四十斤，得银一两。蒙哥汗壬子年（二年，1252），岁捞盐一万五千引，办课引三千绽，划归秦地忽必烈亲王，以充军用。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初立陕西转运司，仍置解盐司于路村。至元四年，立陕西四川转运司。十年，岁办盐六万四千引，计中统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锭。又卷九七《食货志》五《盐法》篇记："陕西行省食盐之户，该办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于内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至元三年，监察御史与陕西省官，运司同知郝中顺等议，郝言："运司每岁办课四十五万锭，陕西该办二十万锭，今止认七万锭，余十三万锭，从何处饮办？"议不合而散。以此可见，解盐岁入按规定为四十五万锭，除陕西五路岁办二十万锭外，其余征之于食解盐各地。

《元史·世祖纪》：至元三十年（1293）正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奏：

> 襄阳旧食京兆盐，以水陆难易计之，莫若改食杨州盐。

结合前述之食解盐户，包括河东、河南、山之南，河南地区并推展至大江以北之襄阳一带。这些地区因食解盐，所以都要承担解盐的课税负担。

安西王国秦，在上述食解盐地区，皆派官吏置使，征收盐税。至元初年岁额为四十五万锭，这个数字后来变化不会太大。忙哥剌死后，阿难答的收入大为减少。大德十一年

(1307)，阿难答被处死，七月，诏令“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分地。”十一月，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为分地，租税悉以赐臣。臣忍宗亲昆弟援例，自五户丝外，余请输之内帑。其陕西运司岁办盐十万引，向给安西王，以此钱斟酌与臣，惟陛下裁之。”“中书会计三路租税及盐课收入，钞四十万锭。”① 引文中的“向给安西王”，指忙哥剌，而非阿难答。

武宗分太子封地中的安西、平江、吉州三路，原归安西王的有安西（京兆）路和吉州路的一部分。京兆路后改安西路，领五州十一县，此时大部分已归陕西四川行省。平江路即唐之苏州，至元十三年升为平江路，辖吴县、长洲二县，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四州，户四十六万六千一百五十八，隶江浙行中书省。吉州路，唐为吉州，后改为庐陵郡，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吉州路总管府，领一司、八县、四州、户四十四万四千八十三，隶江西行省。中书省计算三路租税及盐课收入，为钞四十万锭。皇太子明言陕西运司岁办盐十万引，向经安西王，仅此一项占总数四分之一。盐每引为400斤，十万引共40,000,000斤。至元十三年每引交纳引费为银九贯②，十万引为900，000贯，这还不包括运费、盐价等。实际上，忙哥剌时期，陕西运使办理的盐课是四十五万锭，而不是十万引。所以元人曾说，“经国之费，盐税为重”，甚至还说，“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③。安西王府通过盐课得到巨额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②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355—356页。
③ 上引《元朝史》第354页引《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通例》；《元史》卷一七〇《郝彬传》。

收入，而人民“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① 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王相府撤销以后，这笔收入逐渐归属朝廷，阿难答最终失去了这笔收入。

4、屯田收入

西夏灭亡以后，西北驻屯的大蒙古国军队，陆续经营生产以充军食，蒙哥汗三年，开始屯田于凤翔。中统三年十月，“诏凤翔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② 后划归陕西。至元九年正月，“移凤州屯田于盐白二州”③，可知此前凤州（陕西凤县）也有屯田。兴元（汉中）等地较早时间也以兴办屯田解决粮食。

忙哥剌任安西王，李德辉调任安西王相。李途中遇劝农副使许楫，许言：“京兆之地，荒田数千顷……如募民立屯田耕种，得谷可以给王府之需。”④，李德辉调任安西王相。至元十一年到任。“至则视濒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其中，假牛、种、田具，赋予贫民二千家屯田，最一岁入，得粟麦石十万，刍槀束百万。”⑤ 这一收入，对京兆安西王府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六盘山开成路也设立屯田机构，开办屯田，安西王府不仅继承了辖区内原有的屯田，而且又有新的发展。至元十四年，以李忽兰吉任延安路管军招讨使，寻升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⑥，将陕西屯田置于统一管辖之下。

---

①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④ 《新元史》卷一七三《许楫传》。
⑤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⑥ 《元史》卷一六二《李忽兰吉传》。

《元史·兵志·屯田》，记载了全国屯田的情况。其中陕西所辖屯田，有忙哥剌时期兴办的，也有他死后开办的，但这两种情况，屯户绝大多数是忙哥剌在位时所辖的军民，后者又多是为安置其官兵而经办的。为了便于分析，兹将大致情况摘引于下：

陕西屯田总管府：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以安西王府所管编民二千户，立栎阳、泾阳、渭南屯田。十八年立屯田所。十九年，以军站屯户拘收为怯怜口户计，放还而无所归者，籍为屯户，立安西、平凉屯田。……二十九年，立凤翔、镇原、彭原屯田，放罢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的）延安军人，置立民屯，设立屯田所，寻改为军屯，……为户凤翔一千一百二十七户，镇原九百一十三户，栎阳七百八十六，……泾阳六百九十六户，……彭原一千二百三十八户，安西七百二十四户，……平凉二百八十八户，终南七百七十一户，……渭南八百一十一户。……

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以周至南系官荒地，发归附军，立孝子林、张马村军屯。二十年，以南山把口子巡哨军人八百户于周至县之杏园庄、宁州之大昌原屯田。二十一年，发文州镇戍新附军九百人，立亚柏镇（陕西眉县）军屯。

贵赤延安总管府屯：世祖至元十九年，以拘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为田四百八十六顷。

此外，在四川、甘肃等地于至元十一年以后也设立了大批军民屯田户，屯户、屯田数目超过上列陕西境内数字。忙

哥剌时期，亦归安西王府管辖，其收入也归安西王府。但因与本文主题关系比较远，故省而不录。但不等于说这些屯田不重要，仍相当重要。如为了支援四川的战争军需，至元十年十月，“以川西编民、东川义士军屯田，饷潼川、青居戍兵”①；诏成都路屯田，“办纳屯粮”② 等。我们虽无法考知屯田收入的具体数字，但这批收入在当时蒙古军所进行的征北、征南战争，以及安定西土社会、人民生活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元世祖正是因为看中了这笔收入和它在安定社会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至元十六年九月召见安西王相赵炳后，“以赵炳为安西王相，兼管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③，继续扩大屯田。不久，赵炳被害，安西王相府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陕西四川行省的屯田仍得到大的发展，但这批收入，已经不归安西王府，而归元朝政府了。

5，其他收入

除上述外，史书上还记载有其他的各项收入，列举于后。

至元十年，诏建京兆，开城王城、宫、邸“用不足，取之庙廷（朝廷），岁或多至楮币贯计者，百三十万。”④

至元十二年正月，“安西王相府乞给钞万锭，敕以千锭给之。”三月，赐皇子安西王币帛八千匹，丝万斤。”⑤

以上是忙哥剌时期的额外收入。阿难答即位后，由于王府收入大减，入不付出，不断向世祖告贫，朝廷不时予以恩赐。如：

---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四。
②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③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蒙兀儿史记》卷八《忽必烈可汗本纪》。
④ 姚燧《延厘寺碑》。
⑤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至元二十年五月，“敕以陕西按察司赃罚钱输于秦王。”①

二十三年，陕西行省言：“延安屯田鹰坊总管府，其火失不花军逃散者皆入屯田。今复供秦王阿难答所部阿黑答思饲马及输他赋。”②

二十五年十二月，“安西王阿难答来告，兵士饥，且缺橐驼。诏给米六千石，及骆驼百（峰）”③。

三十一年，五月，元成宗“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万锭。”④

元贞元年正月，“安西王阿难答……言所部贫乏，赐安西王钞二十万锭。……又以陨霜杀禾，复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

二月，“令陕西省臣给其所需，仍以廉访司没入赃罚钞与之。”

六月，以安西王所部出征军妻帑乏食，给粮二千石。”

十一月，“赐安西王甲胄，枪挞、弓矢、橐鞬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⑤。

元贞丙申（二年，1296），阿难答为纪念世祖、顺圣皇后的“深恩大惠，尝请于帝，求即六盘兴庆池园为寺。……制可，加赐黄金两计者二百五十，楮币贯计者五万，米石计者千四百五十”⑥。

元贞二年二月，“赐安西王米三千石，以赈饥民。”

---

①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②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
③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④ 以上并见《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⑤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⑥ 姚燧《延厘寺碑》.

五月，“安西王遣使来告贫乏。帝语之曰：‘世祖以分赍之难，尝有圣训，阿难答亦知之矣。若言贫乏，岂独汝耶？去岁赐钞二十万锭，又给以粮。今与，则诸王以为不均；不与，则汝言人多饿死。其给粮万石，择贫者赈之。”

大德元年二月，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三万锭。”①

五年十二月，“给安西王所部军士食，令各还其家，候春调遣。”②

七年五月，以平叛有功，赐安西王阿难答等各金五十两，银、珠、锦、币等物有差。

八月，“给安西王所部贫民米二万石。”

八年十二月，“赐安西王阿难答……等钞一万四千锭。”

九年三月，“给还安西王积年所减岁赐金五百两，丝一万一千九百斤，仍赐其所部钞万锭。”

七月，“赐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铁木而钞二千锭。”

十年二月，“赐安西王阿难答……钞三万锭。”

八月，“开成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以钞万三千六百锭，粮四万四千一百余石赈之。”

十一月，安西王阿难答所部皆乏食，给米有差③。

以上恩赐赈济，一方面反映自罢王相府，减少安西王府收入后，阿难答的经济状况确实比忙哥剌时期困难得多，军士、部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而另一方面，王府挥霍浪费、借机求索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延厘寺的修筑，就是其中的一例。

---

① 以上并见《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②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③ 以上并见《元史》卷二一《成宗记》四。

开成地震，一次压死故秦王妃等五千余人，可见王府仍拥有庞大的官府、役使等组织。

至大元年（1308），“安西王……既以谋逆诛，版赋入詹事院。”[①] 詹事院“备左右辅翼皇太子之任”[②]，是为皇族太后、太子承担供应任务的办事机构。这样，阿难答时期所有安西王的财产、收入统统归之于皇室。而土地则归行省。四年（1311），设立管领六盘山等处怯怜口民匠都提举司，管奉元等路、平凉等处、开成等处、甘肃宁夏等路、察军脑儿等处长官司怯怜口民匠，下设十提领司[③]。这一机构的设立，与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从安西王阿难答请，设本位诸匠都总管府”[④]，以及对安西王阿难答，其下属民众的管理有关，由此也可看出阿难答后期所领部民的分布状况。

另外，元成宗对阿难答的索求，一再表示指责，所赐数量也少，这一方面是看出阿难答乘世祖之死，不断向成宗施加压力，企图恢复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当时元朝政府的财政确实遇到了困难。《元史·成宗纪》记：成宗即位初，中书省臣就提出：“今诸王藩戚岁耗繁重，……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大德二年二月，成宗向中书省询问收支情况，中书右丞完泽报告：“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四年五月，左丞相答剌罕甚至提出“横费不节，府库渐虚”的严重经济局面。岁赐、恩赐以满足诸王的索求，当属“横费”之列。元成宗想增加对

① 《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
②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③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④ 《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

安西王的经济援助，也是力所不及，而阿难答不注意管理领地属民的生产，致使饥民遍地，四处逃散，田野荒芜，想依靠朝廷援助以改善其经济状况，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与前王相比，阿难答在位二十余年，其经济形势是每况愈下。

八、安西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成吉斯汗在统一蒙古草原的过程中，接触了各种宗教，但大汗始终信奉固有的宗教萨满教，大汗即位大典的仪式，由萨满教大师主持，一切按萨满教的习俗进行。据说，成吉斯汗这一尊号也是采纳了萨满的意见确定的。后来，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在西辽、花剌之模接触了大量的穆斯林，并把大批降众编入自己的军队，为战争服务，其中不少人后来被带回国内，但对伊斯兰教始终没有给以特殊优待。

窝阔台即位后，将其三子阔端安置在河西凉州（甘肃武威），镇守西北。阔端王为了统一藏区，经过调查了解，确定邀请藏传佛教大师萨迦派首领萨班来凉州共议大事。萨班于大蒙古国乃马真后三年（1244）先派其侄子八思巴到达凉州，第三年他也至凉州。蒙哥汗即位后，阔端与萨迦、八思巴等在凉州见面，共商统一西藏大业。阔端王在与萨班等人的接触中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并对八思巴产生好感。阔端和萨迦相继去世，蒙哥汗之弟忽必烈邀请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商谈十分融洽。会见后，忽必烈称八思巴为“上师”。因萨班病逝，八思巴继承萨迦派大师法王的宝座。

忽必烈即汗位，中统元年，尊八思巴为“国师”，统天下释教，命以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新字成，次年忽必烈汗又尊其为“帝师”。十六年（1279）八思巴病死，忽必烈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

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①。至此，藏传佛教萨迦派在蒙古贵族统治者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其势力逐渐深入到皇族的生活之中，并不断在政治思想方面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忙哥剌生年不详。据商挺墓碑：至元十年（1273）诏商挺出任安西王相，忽必烈对其说"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可见忙哥剌此时不过二十来岁。忙哥剌之取名，《多桑蒙古史》引史米德之说，"梵语犹言幸福"②。由至元十年上推二十来年，忙哥剌出生约在蒙哥汗即位初，亦即忽必烈会见八思巴后，佛教的文化已经在忽必烈的家庭中开始发生影响。

但是，忽必烈面临的任务，是统一中国大业。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学习和接受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他除自身努力广交儒士外，还把这种教育扩及到子女当中，使其从小就熟悉中国典籍。《元史·世祖纪》二至元元年（1264）条记：

> 其说书官，皇子忙安（忙阿剌、忙哥剌）以李槃为之；南木合（那木罕）以高道为之。

说书官可理解为侍读、启蒙教师，皇室诸子多设此职。李槃，真定名士。贵由汗三年（1248）经张德辉推荐入忽必烈府中③。蒙哥汗时，奉庄圣太后命侍阿里不哥，伴讲读，后因不附阿里不哥叛，被逮入狱，廉希宪得知，告之于忽必烈，始得获释，重回忽必烈帐下④。忽必烈即汗位，命任忙哥剌侍读。从

---

①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② 冯承钧译本第三卷第四章第349页。
③ 《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
④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至元十三年（1276）以翰林院学士奉诏至南宋临安招纳宋朝儒士，并将宋史书五千余册运还送元国史院[①]等事看，李槃当为地地道道的儒士无疑，而其对忙哥剌所讲的书必然是儒家学说和中原典章制度。

忙哥剌以亲王坐镇关中时，姚燧为王府文学[②]。姚燧自幼受学于其伯父大儒姚枢，后又就学于许衡门下，且由许衡推荐入忙哥剌王府。可见，忙哥剌在至元八年以前，所受教育仍是儒家学说。

忙哥剌由于自幼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尊孔思想根深蒂固，所以至元十年就任安西王后，先后在长安树立“大元京兆府重修文宣王庙碑”，并主祭文庙。《重修文宣王庙碑记》和《皇子安西王文庙释奠记》，分别由徐剡、孟文昌撰，儒学教授骆天骧书并篆额[③]。这些史实说明，忙哥剌的言行是以儒学为根本，并受儒家学说支配的。

忙哥剌有两个儿子，长阿难答，次按摊不花，生年不详。至元十六年（1279）商挺入朝奏事，王妃以忙哥剌死，再次命挺奏请于帝，允以王子阿难答嗣王位。元世祖又以“年少，祖宗之训未习”[④]拒绝。按忙哥剌年龄推算，阿难答当时尚处在幼年时代，其思想不能不受家族的约束和影响。

反映阿难答思想意识和信仰的资料不多，但仍可以看出其梗概。

最能代表其思想、活动的资料，是延厘寺的修建和崇拜。

---

① 《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卷一六四《王构传》。
② 《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
③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石刻》。
④ 《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寺初修于元贞丙申（二年，1296），完成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历时八年，是阿难答成年时提出，经元成宗批准，由王相阿鲁浑主持修建的。关于建寺的原因、动机和寺内崇拜的对象，姚燧《延厘寺碑》记述得非常清楚。

竣工之前，开成路总管府判官常谦奉阿难答之命致书于江西省参行省政事姚燧，请为撰文树碑。碑文称：寺为纪念世祖皇帝、顺圣皇后之“深恩大惠”而修，“为宇事佛，犹不率作”。“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如佛亦视是忠勤而孝恭者，为善而福之，则其教与儒，可殊途而同归也。”铭文中又称：“于昭列圣，事佛尽敬，爰质之书，古无有并”；“静供之修，乘舆必驾；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尚凭佛乘，垂示无极”。从这些文辞分析，延厘寺为佛寺，崇拜佛教，反映出蒙古皇族成员对佛教的敬信和仰慕之情，与当时藏传佛教在皇室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的趋势完全相府。由此可见，阿难答与其父忙哥剌一样，在接受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接受了佛教文化思想。

《陕西通志》卷二八《祠记》一：“龙定寺，在（西安）城西南十五里鱼化寨南，创自元代安西王侍姬池花巴氏。”池花巴氏《元史》不载，龙定寺则为佛寺，说明侍姬亦信仰佛教。

阿难答之子为月鲁铁木儿，曾受元成宗的赏赐。大德十一年（1307）阿难答因参加篡位活动，而且准备称帝，结果因阴谋失败被处死，安西王位也被废止。泰定帝即位后，于至治三年（1323）九月下诏恢复安西王位，命“诸王月鲁铁木儿袭封安西王”①。但是袭位后不久，于同年十一月，“流诸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记》一。

王月鲁铁木儿于云南，按摊不花（阿难答弟）于海南”，“并坐与铁失等逆谋”①。铁失又译为铁赤。阿难答袭封安西王后，曾与脱脱木儿、咬住、拜延等四人并为安西王傅。后因一再要求恢复王相府，遭到世祖、成宗的指责。月鲁铁木儿的谋逆活动一直在继续进行。至文宗至顺三年（1332）四月，“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铁木儿，坐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命宗王、大臣杂鞫之。狱成，三人皆伏诛，仍籍其家。”② 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于先一年被元朝封为“三藏国师”，实为佛教徒，西僧畏兀儿在元朝一直有相当大的势力，并深入皇室、王宫。月鲁铁木儿密谋篡夺政权，与三藏国师等勾结，依靠佛教势力，他至少也是一个佛教徒，而且与佛教大僧关系十分密切。由此可见，阿难答 之子月鲁铁木儿是佛教崇拜者。

阿难答有一个女儿，据邵循正《译释》，为《元史·巴尔术阿儿忒的斤传》中之兀剌真公主。《元史》卷一〇九《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条记：“不鲁罕公主，太宗（窝阔台）孙女，适火赤哈儿子高昌王纽林的斤。主薨，继室以其妹八卜叉公主。又薨，继室以兀剌真公主，世祖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之女也。”虞集《高昌王世勋碑》：“纽林的斤……妻以公主曰不鲁罕，太宗皇帝之孙子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公主。有旨，师出河西，候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甘肃武威永昌堡）焉。……八卜叉公主薨，尚主曰兀剌真，安西王阿难答之女也。”③ 高昌王也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素信佛教。传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② 《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③ 《元文类》卷二六。

至萨伦的斤，因与伊斯兰教东传势力发生斗争，被诬陷，成为宗教斗争的牺牲品。斗争虽然失败，亦都护家族信奉佛教的传统没有改变。纽林的斤后奉诏移驻永昌，兼领火州（高昌），以后永昌就成了高昌王亦都护家族的根据地，直至清代，世系始衰。据作者调查，亦都护家族的后裔直至建立新中国前夕，世世代代与佛教关系密切，婚丧喜庆，请和尚、道士诵经，从未与伊斯兰教发生过关系①。兀剌真公主嫁高昌王纽林的斤，她也应从其家族信仰佛教。

《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记："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人也。性聪敏，习事。国王月仙贴木儿亦都护闻其名，自唆里迷国征为断事官。月仙贴木儿卒，子八儿出阿儿忒亦都护年幼，西辽主鞠儿可汗遣使据其国，且召哈剌亦哈赤北鲁，至则以为诸子师。……从帝（成吉斯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大悦。问哈剌亦哈赤北鲁，则已死矣。乃赐（其子）月朵失野讷都督印章。"死，子乞赤宋忽儿袭爵。死，子"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居平凉。""世祖诏入宿卫为必阇赤，命从安西王忙哥剌出镇六盘。安西王薨，其子阿难答嗣。成宗即位，遣使入朝，因奏：'……来事先王，服勤二十余年矣'。……"成宗可其奏，授其子"阿的迷失贴木儿汝州达鲁花赤。"子阿邻

① 王宗维《高昌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迁居永昌始末》，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贴木儿，“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子沙剌班，“累拜中平章政事、大司徒、宣政院使”。哈剌亦哈赤北鲁祖孙五代仕蒙元十一世，在安西王府供职二十余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阿难答在位时。而月儿思蛮原袭父职，“兼领僧人”；至阿邻贴木儿“翻译诸经”；沙剌班为“宣政院使”；其家世为佛教徒无疑。月儿思蛮与其子阿的迷失贴木儿二十余年在安西王忙哥剌、阿难答府中任事，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能不对其王发生影响；而这些记载中，也毫无反映伊斯兰教的痕迹。

元代史书中并不乏宗王皈依伊斯兰教之事，《新元史》卷一〇六《术赤传》附《伯勒克传》记：“伯勒克，术赤第三子，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斡尔朵讲论教律，太祖子孙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同书卷《月思别传》记：“月思别，父曰土古儿。既嗣位，延祐元年（1314）遣使来朝。月思别初立，诸将多异议，且以月思别奉回教为嫌，定计乘宴饮杀之。或于席上示月思别以目，月思别托故出，询有变，即驰去。”卷一〇八《拖雷传》附《台古塔儿传》：台古塔儿，旭烈兀之子。“至元十九年（1282）诸王大将定议立台古塔儿（为伊儿汗国汗）。夏六月，台古塔儿即位，以素信天方教改名牙世摩特，不称汗，而称苏而滩，下令国人皆奉教。……阿鲁浑虽让位，然心不能平，又不欲入天方教。诸王大将亦多以天方教为非。”以上三条，前者发生于忽必烈之前，后者发生于忽必烈在位时，亦即阿难答将任安西王之际，中间一条发生在元仁宗、英宗时。虽然这三件事都不是发生在中原，而在其他汗国，但宗室诸王、大将的反对情绪都极为强烈，甚至拔刀相杀。可见，蒙古宗室中元朝皇室对伊斯兰教是拒绝接受的。忽必烈

在位时，中亚的几个汗国中确有一批蒙古人信仰伊斯兰教，而且有的汗王也皈依伊斯兰教，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事，但忽必烈直接统治的地区，宗王、大将还未见有类似记载。

以上我们考察了阿难答本人、其侍姬、其子，其女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说是佛教信徒。这种情况，和元朝皇族当时的宗教信仰倾向和生活环境相一致。从忽必烈即位开始，先后尊八思巴为“国师”、“帝师”，这种思想，不能不影响他的子孙。忙哥剌是其三子，阿难答是忙哥剌之长子，他们封王都在忽必烈执政时期，其思想不能不同忽必烈保持一致。

但是，中外史书、学者中也有安西王为伊斯兰教徒的说法，下面略作分析。

第一，1957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复查和勘测安西王城遗址时，发现在宫殿“夯土台基中（由台基最高点向下约25米）出土了5块铸有阿拉伯数码字的方形铁板，五块铁板均相同，长宽各14.2厘米，厚1.5厘米。其中四块在出土时全是夹在凿制整齐的两块方石（石函）之中，在下边一块方石向上的一面，于中间凿一方槽，槽的大小和深度与铁板的大小，厚度相等，铁板即放在槽内，铸文的一面向上。……另外一块是基建部门交来的，其位置已不详，据说出土时亦是藏在石函内，与以上四块的情形相同。”[①]夏鼐先生研究，撰写《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发表在上引同期《考古》上，云：

这几件六六幻方，都是铸在正方形铁板上……理在

① 马得志《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分土台的房基中。它们的作用，和埃及法老时代的“奠基埋藏”相同。……重要建筑物奠基时，常在基地中埋藏一些压胜或辟邪的器物，以求保护这些建筑物永久不受灾害。我们这几件幻方铁板的埋藏，用意当是相同的。……

根据这些数码，可以确知它们是阿拉伯的东西。上面第一节中已提到安西王阿难答是一个笃诚的回教徒，善写阿拉伯文字，而他的父亲安西王忙哥剌可能晚年也信崇回教，至少他的亲信中有回教徒。

夏先生的考证、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仍可以提出几点疑问。1，阿拉伯数码铸造的幻方，是不是等于伊斯兰教徒制作的幻方?因当时使用阿拉伯数码的人并不限于穆斯林；2，幻方埋于宫殿地基之下，如埃及传统以作压胜和辟邪，那么，这里是作为凶物，还是吉物？3，幻方作为奠基物是忙哥剌所为，还是赵炳所为？4，至于所说“阿难答是一个笃诚的回教徒”，“忙哥剌可能晚年也崇信回教”说，下面还作详细讨论。

诚然，安西王属下有一批西域诸色目人，诸色目人中包括探马赤军，也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探马赤军中既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诸色目人中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量存在。阿拉伯数码当时使用于中亚穆斯林地区，也传入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以至欧洲。就以《马哥孛罗游记》所记为例，说京兆城“人民皆拜偶像（佛教），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可见这里的伊斯兰教徒放在世界宗教的第三位，人数大大低于前二种。这里我们无法排除其他宗教信仰者和不信仰宗教的人制作这种幻方可能性。

重要建筑物之下埋压胜物，不仅埃及有，中国也有。中

国古代传统用于地基压胜之物，除金银货币之外，还有吉物和凶物两种。幻方显然在这里不是作为吉祥物和崇拜物，而是作为妖术、魔术之类压于地基深处镇压之。这种纵横数字图，中国古代也有，但数字没有这么多。当时从西域带回这种幻方后，大概不能作为科学成果来解释，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妖术。如果这一推论成立，此幻方不尽没有反映制造者或敬送者的崇高地位，恰巧相反，而是以此来压邪。

当时主持修建王城王宫的是赵炳，一切"悉听炳裁制"①，压胜物的选择也不例外。赵炳，惠州滦阳（河北唐山北）人，勋阀之子，自幼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修治宫室也以中原传统观念为依据。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赵炳为了修筑王城、王宫，四处寻访，搜求掌故。骆天骧是当时人，年长于炳，接受采访，自在意料之中。因此对压胜物的选择，自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决定权恐怕不在忙哥剌，而在赵炳手中。即便幻方出自穆斯林手，赵炳以其压胜，并不表示对伊斯兰教的敬信，而是相反。至于夏先生所说忙哥剌晚年信崇回教，我们实难找到根据。忙哥剌死时，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说不上是晚年，上引他死前为孔子立碑，祭奠孔子，按伊斯兰教规定，属偶像崇，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二，夏先生所说阿难答是一个笃诚的回教徒，善写阿拉伯文字，其根据是《多桑蒙古史》。《多桑蒙古史》又根据拉施特《史集》。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把《史集》第二卷的有关部分抄录下来。

《成吉斯汗之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合罕记》第一部分记：

① 《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

第三个儿子忙哥剌，为察必哈敦所生。他有个长妻名叫忽难，为忻都（印度—引者）语“公主”之意，是弘吉剌部阿勒赤那颜的侄女。他有三个儿子，依次如下：[Ⅰ] 第一个儿子阿儿思兰—不花。[Ⅱ] 第二个儿子按摊—不花。[Ⅲ] 第三个儿子阿难答。[他的名字的由来如下：] 当他出生时，[附近] 有一作乱的部落，其异密名为阿难答。他遂 [以此人之名] 被取名为阿难答。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合罕将唐兀惕地区赐给作营地，他有个儿子名叫月鲁—贴木儿，还有个女儿 [名字不详]①。

成吉斯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之子真金之子铁穆耳合罕记第二部分：

宗王阿难答，忽必烈合罕第三子忙哥剌的儿子。……忽必烈合罕死后，铁穆耳合罕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忽必烈合罕给予忙哥剌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而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河西，即西方的大河。该处有以下一些大城为其君主之京城。京兆府、甘州府、……、……、……和阿黑——八里[白城]。在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乃为偶像教徒。在外形上他们类似汉人。在此以前，他们向汉地君主缴纳赋税，并且给他们的城市以汉语名称，他们的规矩、习俗、法令和制度相似。

因为阿难答的父亲忙哥剌的子女长不大，所以阿难

① 余大钧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83—284页。译注云：“据《元史·宗室世系表》，阿难答实长于按摊不花。”女儿据邵循正《译释》“当即《元史》121[卷]《巴而术阿儿忒的斤传》之兀剌真公主。”

答被托付给了一个名为蔑黑贴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伊斯兰教徒，让这个人抚养［他］。这个人的妻子名祖来哈，把他奶大，因此木速蛮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他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磨于履行戒律和祈祷上，同时，他还使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的］异密之中，有一个撒儿塔黑，是一个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他前往合罕处抱怨说，阿难答经常都在教堂中，从事于祈祷和念诵《古兰经》，他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了割礼，并且使大部分蒙古军队皈依了伊斯兰教。合罕对他甚为生气，并派遣了鹰夫长只儿哈朗和赤儿塔合兄弟俩，要他们去阻止他履行祈祷和戒律，不让木速蛮去见他，并促使［他］向寺庙中的偶像磕头烧香，阿难答拒绝了，没有听从。……合罕由此动了怒，便下令把他囚禁起来，而他却对伊斯兰教和真正的信仰仍然那样的固执和坚定。……阿难答有很多军队，并且唐兀惕地区的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并对此执［迷不悟］。……

从阿难答和他的军队的状况可以作出结论，最近，伊斯兰教的事业就将在该境中臻于完成，并按《古兰经》的名言“他们将成群加入安拉的教”，他们将成群地加入。……

阿难答甚为关心伊斯兰教。他再一次统辖了唐兀惕的军队和地区，并全面地掌管着它，虽然该处也有合罕的大臣和必阇赤主管税关，但大部分税收都被用于他的

军队，并且丝毫也不再向底万上缴了。不承认伊斯兰教，并且曾经揭发过阿难答的撒儿塔黑，现在也成了木速蛮。阿难答现今大约三十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月鲁——贴木儿，他在自己的兀鲁思中坐在王位上掌着大权。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缅于祈祷①。

我们不排斥阿难答从小由一位穆斯林抚养并受其一定影响的可能性，但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不能夸大。而《史集》的以上记载，则难以令人完全相信，甚至可以说是不能服人。

这段记载的取材，约为成宗大德中（公元1301—1302年），当时阿难答三十岁。由此上溯三十年，为至元九年（1272），即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前后，与我们前面推算忙哥剌死时（1278）阿难答将进入少年时代相符。这也就是忽必烈帝不让他立即继承王位的主要原因，因他还不懂事。

《史集》中有许多明显错误：如“忽必烈合罕死后，铁穆耳合罕（元成宗）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忽必烈合罕给予忙哥剌的那支军队，以及原属于他的唐兀惕地区，赐给了阿难答”。而实际上至元十五年（1269）底忙哥剌死后，阿难答合法不合法已经自称安西王，至此时已经有十六年的历史了，元成宗只是接受既成事实而已，并不断指责阿难答的索要和苛求。

唐兀惕指西夏王朝统治地区，河西指黄河以西。西夏王朝的疆域东南从未过渭水上游和六盘山，而《史集》则把京兆（长安）、汉中等地都划入唐兀地区，把河西解释为“西方

① 《史集》第二卷第378—382页，上引余大钧译本。

的大河”，显然是错误的。

又说唐兀惕“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而《马哥孛罗游记》中，则记载：凉州“还有摩诃末信徒”；西宁“也有少许拜摩诃末的”①；宁夏“人民拜偶像，但那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也有三个教堂”②，未说伊斯兰教；河中府山西永济“人民皆是拜偶像，祇略有少许基督教徒及回回教而已”③；京兆府以东“所有人民皆拜偶像，此外有少数突厥人，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又有少数回回教徒”④；京兆府大城，“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⑤；汉中地区，“人民皆拜偶像”，“人民皆是偶像教徒”⑥。在各种宗教中，伊斯兰教徒都是放在最少数的地位。以上所举的几个点，可以基本代表安西王忙哥剌时期辖区内各种宗教的活动情况。而阿难答即位后，变化不会太大，甚至不可能有大的变化。《马哥孛罗游记》比起《史集》所记，要真实可靠。结合汉、蒙文献，安西王辖区的居民，有汉、藏、蒙、羌、浑等族，他们信仰佛教。畏兀儿的大多数人也信佛教。西域诸色目人的突厥有信基督的，也有信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徒在所有居民中仅占极少数。

《史集》称，阿难答因从小受穆斯林家庭的抚养，伊斯兰教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背诵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

①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118页。
②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120页。
③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24页。
④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24页。
⑤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25页。
⑥ 张显煃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26—227页。

磨于履行戒律和祈祷上。”阿难答的父亲忙哥剌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直到出任安西王前夕，儒学家姚燧还给他担任文学侍读，直至至元十二年，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忙哥剌王后忽难，出身于弘吉剌部，取名忽难，为印度语，即佛家语，这与当时蒙古贵族开始崇信佛教有关。由此可见，忙哥剌的家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受佛教影响的思想环境。王府有王相、王傅和王太子傅。王相商挺、李德辉、赵炳、都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尤其被忽必烈深为信赖、托付王事的商挺，字孟卿，在诸儒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些人主持王相府事，进出王府，不能不对阿难答等王子有重要影响。王傅姓名，史不详记，但都有皇室任命，其思想言行不能不受忽必烈的影响。王子阿难答学习，入门必须先学蒙古字和汉字，蒙文中还包括八思巴新字，这两种文字的难度极大，但必须掌握，这样，他背诵《古兰教》，用大食文书写，而且写得很好，很难令人相信。至于履行戒律，首先必须有清真寺、阿訇及其有关设施。就目前已有的资料，王府没有清真寺，官职中没有阿訇，整个元室贵族对戒律也不清楚。至元十六年（1279）十二月，“巴里黑贡海青，其使摩诃末教徒（伊斯兰教徒）所过贡以食羊，非手刲（《元史、世祖纪》作“非自杀”）者不食，驿人苦之。汗闻，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从吾国俗耶！’禁之。”① 不食自死牛羊，是伊斯兰教的规定，而忽必烈对此尚不清楚，其皇孙阿难答进入皇宫，如何履行禁忌。2 至元二十七年（1290）七月，“沙不丁以仓库官盗欺钱粮，请依宋法黥，而断其腕。汗曰：‘此回回法也，不可用’。”② 可见伊斯兰教法

① 《蒙兀儿史记》卷八《忽必烈可汗纪》，参《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② 《蒙兀儿史记》卷八《忽必烈可汗纪》。

在元朝是禁止使用的。朝廷禁用，而安西王焉能使用。

至于阿难答的十五万军队的大部分都皈依伊斯兰教一事，更是与事实不符。前面第六节，我们专门讨论了安西王府的军队问题，所谓十多万军队，是指忙哥剌任安西王时兼领陕西、四川、河西、吐蕃军民之政时的情况，而他的直辖军队，约为一万多人。忙哥剌死，忽必烈诏罢王相府，设行省，把大批军队或遣散，或转入屯田，而阿难答所有领地仅京兆王城附近的一部分，开成地区，和六盘山后至察汗淖尔牧场等地，拥有军队最多不过一万余人。屯田军大批转归行省管辖，王府保留的极少。所以，阿难答拥有十五万军队之说不确。

这批军队中，原来本有一批穆斯林军人，这在下一节中讨论。他们有的从西域迁来时，就是伊斯兰教教徒，在与其他非穆斯林共同生活、战争中，影响了他们，使其接受伊斯兰教，穆斯林人数增加，与阿难答关系不大。而且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发展，时间稍晚，元代后期才大量发展起来。安西王阿难答的家室，我们还找不到伊斯兰教发展的痕迹。《史集》说阿难答的儿子月鲁贴木儿，经常念诵《古兰经》，沉缅于祈祷。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月鲁贴木儿与佛教徒打得火热，最后因与西僧三藏法师等谋逆，被处以死刑。其女兀剌真，与佛教徒结婚，也不能说是穆斯林。依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的子女，不许皈依其他宗教，特别是偶像崇拜者，而其子女都成了偶像崇拜者。

阿难答本人在他最后十年的黄金时代，用了八年时间，

"以都城（北京）敕建诸寺为师而小之"①，在六盘山修建了延厘佛寺，全家顶礼膜拜。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可以否定《史集》中这些不实之辞。

《史集》为什么有上述记载，这要从作者拉施特本人进行分析。

拉施特·安·丁于公元1247年出生于伊朗哈马丹，祖先为犹太人。他三十岁时为伊利汗阿八哈效劳时，皈依了伊斯兰教，时间约为安西王忙哥剌死前一年。当时他担任御医，声望颇高。1295年合赞汗即位后，受到赏识，并于三年后出任宰相，积极支持合赞汗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而他自己也成了汗国的大封建主，拥有大量权力、财产和土地。1318年7月18日以毒死完者都汗的罪名被处死。

伊利汗、合赞汗等都是成吉斯汗的后裔。大约在1246—1253年之间蒙古贵族钦察汗国的别儿哥三兄弟改信伊斯兰教后，②统治中亚的蒙古诸汗王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伊利汗和合赞汗相继统治伊利汗国时，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周围的大臣、贵戚都是穆斯林，拉施特为了在政治上施展才能，约于1277年皈依了伊斯兰教。为了迎合汗王的心理，为蒙古汗王大唱颂歌，宣扬伊斯兰教，书中充满了颂场、赞美之词。

拉施特一生没有到过中国，而他对安西王家世的记述，全部来自道听途说。从书中对忙哥剌记载很少，而对阿难答记载颇多，说明所记为马哥孛罗以后的情况。取材下限约为元

① 姚燧《延厘寺碑》。

② 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页51，转引自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第204页注。

成宗大德中，即延厘寺竣工前夕。向拉施特反映情况的，可能是中亚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回去后告诉拉施特或者他们的属下，于是，编纂者不加细考，依样画葫芦，有的，没有的，真的假的，统统搬入书中。余大钧等在汉译者序中写道："作为封建时代的宰相兼宫廷史家的拉施特奉诏编纂的钦定史书《史集》，无疑包含有不少糟粕和毒素。"① 其中关于阿难答史料的记述，就属于糟粕之类，我们无法相信。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其全书，也不是否定关于安西王部分的全部记载，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利用其中有价值的史料"②。而正确记载这部分资料的，首推当时的汉、蒙文史籍。我们就应以汉蒙文史载中的资料鉴别其真伪，说明真实情况，不为假话所迷惑。

《史集》的这部分捕风捉影之辞，《多桑蒙古史》基本照抄：

> 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之抚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布回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难答熟知《可兰经》，善写阿剌壁文字。其臣某诉之于皇帝铁木耳，言宗王阿难答终日在礼拜寺中诵《可兰经》，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传回教于军中。铁木耳遣使者二人往说其皈依佛教，阿难答不从。帝召之至，面谕之，亦无效，乃拘禁之。其后未久，太后阔阔真以为阿难答在唐兀之地颇得人心，锢之恐致民怨，言于帝，释之还镇③。

① 《史集》汉译本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
② 《史集》汉译本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
③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第 360 页。

拘禁阿难答，当为大事。然而，遍查《元史》纪传和《蒙兀儿史记》，找不到一点线索，而在成宗时期，阿难答与皇室的来往更加频繁，成宗死，阿难答几乎继承帝位。如果他已皈依伊斯兰教，当时朝臣是不会赞成的。

总之，阿难答属下有伊斯兰教徒，他也有可能受其影响，但说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十分虔诚，证据不足。

九、安西王属下的穆斯林

窝阔台汗乙未（1235年）括户，其中关于回回户籍的材料，已经无法查找。陈得芝先生根据王恽《乌台笔补》所收《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所记中都路回回人户，“自壬子年定籍并中统四年（1263）续抄，计二千九百五十三户”，认为“中都路的回回是壬子即元宪宗二年（1252）括户时定籍的，中统四年又进行了补充抄籍。壬子括户是全国性的户口登记造籍，中都路户籍即立有回回户，其他诸路（若有回回人居住）自然也是有的。”所引圣旨中指出“木速儿蛮回回”“规定在现住处与民一体当差”，说明从这时起各族穆斯林“已经用回回人户的名称登记了”①。

忽以烈汗中统三年（1262）三月，诏令“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②。四年十一月，诏“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③。至元二年（1265）二月，“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④五年三月，“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⑤七

① 陈得芝《元代回回在人史事杂识》，载《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1991年。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④ 《元史》卷五《世祖纪》三。
⑤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年七月，“签诸道回回军”① 八年九月，“签西夏回回军”②。次年五月，“罢签回回军”③。以上反映从蒙哥汗至至元九年期间木速蛮、答失蛮、回回的情况，说明他们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比汉人、契丹、女真等优越的政治地位，但都要承担缴纳赋税，应征兵役的义务，其中特别提出“签西夏回回军”。但是，仅就以上资料，还无法说明忙哥剌出任安西王以前，陕、川、河西究竟有多少“回回户籍”（仅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此“回回”与以后的“回族”、“回回”也不能等同。

就是安西王执政时期，甚至整个元朝，能直接说明安西王属下穆斯林状况的资料，也是寥寥无几。因此，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采取倒述的办法，论证这一问题。

《万历武功录》卷一《陕西回夷列传》记：

> 回夷，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岁时麦熟，皆携夷小卖茶课命，仰食他旁郡，岁凶亦如之。是时，里中暴子弟，多有附回夷而起者矣。丙戌岁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骑马赢，持弓矢、枪刀诸斗器，由泾州直走灵台县，……复奔麟游县，……走永寿县，……走三水县之土桥镇……走淳化郑家山，……走耀州，……因合蒲城果园里、白水苜宿沟诸回夷。
>
> 诏曰：地方官不能及时剿除，却有借名招安，苟幸无事，殊为玩寇废法。今后再不许畏缩坐视，徒以虚文塞责，致贻民害。于是上锐意欲驱除此曹矣。其后督抚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②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③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请于上，乃得以回夷编立保甲，著为令：令毋聚党，毋持兵，毋抢掠。岁时诸回夷所流行，逻司常从走卒游徼道上，以备为寇……以故回夷遂得居西、延、庆、平、凤、汉间。

清代毛奇龄《胜朝遗事·后鉴录》也有“回种遍天下，陕西延、庆间尤众”的记载。

上述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汉中，元代属陕西五路（汉中开始虽不是，但至元初为陕川行中书治所所在，回回人赛典赤任行省平章政事）；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后，这些都是安西王辖区。蒙哥汗初年，关中人口，户不满万，此主要指原有居民。姚枢以亲王忽必烈王府尚书至京兆，“置宣抚司，以杨中书为使，奏诸千夫长不法，夺有人室者，旬月之间，民大和洽。”① 千夫长制行之于蒙古探马赤军和诸色目军中，可见关中居民中已增加了诸色人种。至元十年（1273）正月，诏以“陕西京兆、延安、凤翔三路诸色人户，约六万户内，签军六千”②。三路诸色人户达六万户，其户数之增加是相当惊人的。这次签军是先一年和同年诏令“阅……京兆等处探马赤户名籍”、“签陕西探马赤军”之后进行的，三路诸色人户，无疑是签军的对象。在签军的同时，又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③，在京兆、延安、凤翔所签探马赤军，随地入社，即入此在三府村社。而延安还有专门的探马赤草地牧场供探马赤军放牧。

忙哥剌死后，元朝政府将安西王属下的大批军士转向屯

①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② 《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田。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则成了屯田的主要对象。明朝省元之开成路，归平凉府，此平凉包括固原州及其辖区，亦即安西王夏宫属地。

关中屯田，始于蒙哥汗三年（1253）。忽必烈受京兆分地，“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① 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三年（1262）十月，“诏凤翔府屯田军隶兵籍，仍屯田凤翔”②。从此，凤翔府屯田不断扩大。

京兆府屯田始于中统四年（1263）。是年正月，“以宋忽儿、灭里及沙只回回鹰坊等兵戍商州、蓝田诸隘。”③ 沙只回回从姓名上分析，当是穆斯林。至元元年（1264），发万户石抹纟札剌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④。商州时属京兆府。安西王设置后，京兆地区屯田大为增加。

延安路屯田，始于忽必烈汗即位初。至元十四年（1277），宗王秃鲁叛于六盘山，延安路管军招讨使李忽兰吉率所部延安路军参加平叛。事后，“承制授（李忽兰吉为）京兆、延安、凤翔三路管军都尉，兼屯田守卫事”⑤。十八年以后，延安成为重要屯田区之一。

六盘山地区，元初隶巩昌路，平凉隶凤翔府。至元十年（1273）安西王开府开成，设开成府和开成路屯田总管府，屯田开成。至元二十年（1283）十一月，罢屯田总管府，并入开成路，隶京兆宣慰司⑥。

---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②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③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④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⑤ 《元史》卷一六二《李忽兰吉传》。
⑥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根据以上所述并《元史·兵志·屯田》所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军民屯田》条的资料，陕西省境设立屯田的有：凤翔、镇原、彭原（后二地分属甘肃、宁夏）、平凉、开成。六盘山屯田还延伸至宁夏黄河。西安、终南、蓝田、周至、鄠县、泾阳、临潼、渭南、延安等。延安屯田还向北延伸至察罕脑儿（内蒙古红柳河）、红城（内蒙古托克托东）。各地屯田户成分大部分是诸色目人，有的是“安西王府所管编民”，有的是“军站屯户拘收为怯怜口户籍放还而无所归者”；有的是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的延安军人，包括探马赤军；有的是“拘收赎身、放良、不兰奚及漏籍户计”；还有安西王府协济户。总计从事屯田的人户，截止至元二十四年，已达五、六万人以上。

上述分布情况，与《回夷列传》所载回回居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间的位置完全相府。丙戌岁大饥，指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的大旱灾和地震，灾情连续两年。《明实录》卷一七四神宗朝万历十四年五月条已经记载了陕西的灾情。卷一七六七月条称，当时全国大面积受灾，“陕西等处尤甚”，于是发生了“陕西有回夷流劫之乱”。卷一七八九月条记，当时不仅平凉回回流入关中，而且还有“西（安）、凤（翔）二府饥民流徙延（安）庆（阳）等处”的情况。在饥民流徙、各族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反抗情绪在日益增涨。明政府官员也发现“陕西则北虏（蒙古）、西番（藏族）、回夷、茶矿诸徒环伺衅隙”，大有揭竿而起之势。政府为了弹压，曾经采取免赋赈济等一些措施，但直至十一月，“嗷嗷待哺之民，不得速沾实惠。”杯水难济车薪。当时这种反抗斗争，由于各族人民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加

上明朝政府在陕西屯驻重兵，处处防御，正如《回夷列传》所记，“以回夷编立保甲”，“令毋聚党，毋持兵，毋抢掠”，“诸回夷所流行，逻司常从走卒游徼道上”等镇压措施，进行隔离、封锁、加强反动统治，使人民的反抗斗争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明万历年间，西安、延安、庆阳、平凉、凤翔的回民，已经在相互联系，组织自己。泾州回民大概是从六盘山固原等地而来，他们避开官道，从灵台进入陕西，走麟游、永寿、三水、淳化、耀州、合蒲城、白水等县之回回；西安、凤翔等地之饥民（包括回回）也向延安、庆阳等地发展。当时，西安大阿訇胡登洲所创经堂教育正在进行之中，所授学员还未发展到足以使陕西回回统一组织起来的程度，因而各地回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力量分散，最后被明朝政府各个击败了。

上述西安、延安、平凉、庆阳、凤翔等五府，明代万历年间已经是回民居住区。而这些居住区又是元代屯田的重点地区，仅西安、凤翔、延安屯户已达五、六万人之数。屯户又多是原安西王忙哥剌死后元世祖为分散王府原辖的军队于至元十八年起采取的一项措施，其为安西王部属无疑。但这些屯户原先并非全系穆斯林，至明代万历年间穆斯林（所谓的“回夷”）仍是少数，在清代初年西安附近的沙滩沱、金滩沱、滩沱寨等命名的村子还有好几个。滩沱为蒙古语浩特之别泽，其为蒙古村寨无疑，后来这些屯户发展成为汉民，发展成为回民的仅为其中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对几个元朝驻兵屯田点加以考察。

京兆（西安）是西土重镇，忽必烈早期的封地，又是安

西王宫城所在。忽必烈即位后，因京兆与南宋辖区相距不远，所以驻有重兵。秦岭当子午道、蓝田道等南通要道，忽必烈即位初，即在南山谷口、蓝田等地派驻屯兵。清代蓝田县回村分布在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嘴头、金花、阴沉、马里滩、多数接近交通线，可能与屯戍军有关。长安南山，屏障西安，清代回民分布，从西安南郊之叶护坟、丁白村、南沈家桥、方桥头、杜城首帕张、河湾村、西坡上、三会寺（俗称“散回子”）直达南山，连绵数十里，达数十村庄皆有回民分布，与元代守御南山谷口的屯军不无关系。

西安另一回民居住区在城东北方向。元代安西王府就在东北五、六里处。安西王城为安西王所居之所，王城外围，“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包原络野，周四十里”①。今王城东北四里处有西安回民公墓，称光太门公墓，因其东北一里有唐代光太门、光太里而得名。公墓旁原有“马氏祖茔”，公墓即由此发展而来。祖茔上树有清乾隆二十四年所刻的石碑两块，其中之一，下半部分刻有咸宁、长安两县公立石碑的村名共六十三个。这幢石碑为我们了解当时西安地区及其附近回民分布情况提供了可信依据。

安西王城周围环绕着老人仓、杜家街、秦家街、孟家街、田家街、尹家街、东角门、苏家街、王院门等近十个村子，无一出现在碑文上，说明这些村子虽与马氏祖茔相邻，但不是回民村庄。分析其原因，当日王城周围驻的是蒙古亲军，保卫王城，平日挽弓披甲，扈从王室，不参加生产，等王室败落，他们也就散离各地，离开王畿。现在这些村子的名称，大

① 姚燧《延厘寺碑》。

多数以街为名，而不是按蒙古语称“浩特”，或从汉语称村坊，证明他们是元以后陆续从别处迁来，定居于此，而不是元代居民。访问调查，反映也是如此，他们对原来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仅仅是些传闻。

这些村庄的外围，周四十里附近，碑文上记载着二十多个村子，有东菜园、西菜园、午门村、八府庄、石碑寨、井而上、大梁村、石家洼、东刘村、草滩里、桥上、牛而寺、方村、东铺上、米家崖、沙家庄、新庄里、水洼堡、团庄里、洛家堡、沟上、疙瘩寺、西草店村、八家里、冯家滩。此外还有白花村等。这些村庄几乎是连成一片。

东西菜园在西安城北门外，修建陇海铁路时被占，此时已无回民。相传回民善种蔬菜、花卉，城四周有许多回民菜地，光太门马家清代花园、菜园占地十余亩，并利用崖坡挡风寒，修建温室，保护花卉、蔬菜过冬。

午门村在西安城东北 3 里，为一大村，清代设午门仓于此。

八府庄，在城东北唐含元殿遗址东约五里处，据说因设官府而得名。

石碑寨，即石碑寨，因此处原有石碑而得名，今已无碑保存，寨东不远即安西王城。

井而上，即井儿上，又称辘轳井，今分井南、井北、井西三村，因有大水井灌溉田地而得名。

大梁村，今称梁家，在辛家庙北十余里，徐家湾以东。

石家洼，又称石家道、石家街，在王城遗址西南约二里处，东邻秦家街、孟家街。另外 西安灞桥纺织城东灞河南岸上，也有石家道，未知两者关系如何。回民中姓石的较多。

东刘村，安西王城遗址正北一里许，有刘家堡。另外，在灞桥以东石家道以西，也有一村，叫刘家。

草滩里，即今北草滩镇的前身，当西安至泾阳，三原间渭河渡口要塞。

桥上，即灞桥镇，今当地人仍称其镇为桥上。

牛而寺，即今牛儿寺，在米家崖以东的浐河东滩上，当日是草滩荒地，水草丰足，今称南牛、北牛。

方村，今称方家村，紧接灞桥镇东。据当地人说方家村原为回村，其东南邻之西渠村，也有回民。

米家崖，在王城正东浐河西岸坡上，现在因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而更加著名。此村回民因姓米而得名，且善于长途经商。

东铺上，即今东十里铺，位于浐河西坡，当东西交通大道，来往行人必经之所。

沙家庄，又称沙家，在米家崖北。

新庄里，又称新庄、新房（坊）村。在光太门南约一里，辖仲家巷、寺门口（即光太门清真寺门口）、石家巷、陈杜社、李家巷、南窑村等六村。相传这些村子兴起于明代。

水洼堡，在井上村东北，广太门正北，因当地人洼、凹、腰读音相近，称水腰村，今称上水腰、下水腰村。嘉庆《咸宁县志》又称“水窑四村”。此地多水，形成许多沼泽。

团庄里，似在水腰村附近。

洛家堡，今因与袁家村合并，称袁洛堡。位于徐家湾以东，滨临灞河。

沟上村，在洛家堡西，徐家湾东。

八家里，在草滩镇东五里，临渭河。据说明末清初，有

八户马姓人在此开荒种地，形成村庄。初为八马家，八马堡，八家堡，后称八家里。

冯家滩，在八家里东北，灞河入渭河河口处西南，因最早为冯姓回民居此开荒而得名，户数不多。

光太门，即光太里。清代包括四村，现在为五村，由东南向西北，依次是马家湾、上堡子（村中心），窑场、什字、后街。原编为十甲，清代回民住七甲、八甲，其余为汉人。回民一部分住于马家湾，计二十四户，全在窑洞居住；一部分住于上堡子南，和汉人杂居，也是二十四户，总共四十八户。汉人户数，约八十余户。广太门本堡东邻悬崖，南接马家湾，东墙无门，仅西、南、北墙有门，原先汉民住西门和北门，回民住南门，后又另开一西门，主要是回民通行，与马家湾，上堡子村回民来往联系。这里的回民和新庄回民共修一座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寺很大，当日占地达十余亩，修建得很壮观，有琉璃瓦、刻花砖等建筑材料残留下来。

以上我们概括叙述了原安西王城周四十里回民分布状况。当日安西王城附近驻有大批军队，其中不乏西域诸色目人。从安西王府撤销以后，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阿难答准备篡夺帝位，也没有从这里调兵；明朝灭元，京兆地区战争规模较小，因而此地人户变化不是很大。由此可以推测，这一块地区的回民，大概就是元安西王统治下的戍军中后来有一部分信仰了伊斯兰教，逐渐发展而来。最后形成这一状况，在明代中后期。

此地区东北，是浐河、灞河、泾河、渭河汇合地区。浐河在光太门东北，入灞河。灞河北流，在西北来的泾河入渭处对岸入渭河。在诸河相汇之处，构成方圆达百里的河滩地，

宜耕宜牧，元初更适合放牧。

安西王初封，至元十一年（1274）李德辉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则视灞泾营牧故地，可得数千顷，起庐舍、疏沟浍其中”①，进行屯田，解决了安西王燃眉之急。以后这一带就成了重要屯田区。灞泾指泾河南北岸。泾河南岸今分属泾阳、咸阳、高陵三县，北岸分属泾阳，高陵两县。泾阳县泾河以南的寨头村西，自庙店、赫（黑）家滩，接连咸阳的侯家村、毛家沟、苏家沟，当日都住着回民。在此以东的高庄（高阳庄）一带，也是回民。河以北的泾阳崇文塔，周围称塔底下，更是回民的一个聚居区。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时，这里是回民的重要据点，也是东通渭南、大荔，南抵西安的交通枢纽，著名领袖杨文治就生在这里。

由此往东，接高陵县。当日高陵县回民主要分布在泾河南北岸。目前见于史书记载的陕西最早的清真寺，即建于元至正年间高陵渭河南的清真寺。

灞河以东，今西安东北的新筑、水流、新合一带，又是一大回民分布区。见于马氏祖茔碑文的村子有：

杏园头东西二堡，在灞河东新筑镇西南。

东砂河二村，在灞河下游以北的河滩上，当地人称砂河，今蓝家庄、老堡子、西堡子，都是当日回民的村庄，也是回民所立义塾（学）之所在。

东草店，在水流乡治所东，其西有南草店、北草店。

唐家村，又称回回唐家。今东唐村在新合乡西北五里，西唐村在水流乡水流村东二里。

---

① 姚燧《牧庵集》卷三十《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

上、下班家，今称班家村，又称班家堡，在水流乡治东北二里。

南北摆、铁二村，《咸宁县志》称拜、贴村，因所居回民姓拜（摆）、贴（铁）而得名。

寇家东西二堡，今称东寇家村、西寇家村，前者属新合乡，后者属水流乡。两乡北边，有买家村、南摆（拜）村，也是回村。

马五十东西二堡，合称马家堡，在水流乡草店村南。

东全子头，在新合乡东与临潼县交界处，因有地名西泉，全、泉同音，讹为全，东泉子头，在泉东。

西撒家村，在东撒家村西。

苏家堡，今称苏家村，在新合乡东约二里处，东接临潼。

抵家堡，在新合乡苏家村东北二里，《咸宁县志》称纸候堡，东为侯家村，西为纸家村，纸、抵音近，讹为抵家堡，或原为邸家堡①。

碑文列有行车桥等村，属临潼，在此不赘述。实际上，行车桥以东，渭河两岸，回民村庄连绵分布，经渭南、华县、大荔、恐怕数以百计。

碑文所列村名，还给我们一点启示，像拜（摆）班、铁（贴）、撒等姓，恐怕原是蒙古姓名简化而来。今大荔沙苑中心，有数十家姓班（拜）、姓铁（贴）、姓达的，自认为是汉民，但其家族谱系，明白说出他们是蒙古之后。元朝灭亡后，隐居沙苑，虽附近有回村，但他们与汉族交往，接爱汉文化，从汉人风俗习惯，加入汉族籍。由此也可以看出，就是安西

① 以上所述之村坊，可参见王宗维《清代中叶前西安地区回民的分布和经济生活》，载《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三秦出版社。

王的部属，在安西王府撤除后，大部分转向屯田，而这些屯户，后来并非全部加入伊斯兰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也不一定全是原安西王忙哥剌的部属，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安西王属下的穆斯林，在保持其宗教信仰，发展伊斯兰教徒，壮大伊斯兰教势力中起了骨干作用。

以上叙述了京兆路地区的西安、泾阳、栎阳（临潼县境渭河北，高陵县东）、渭南等处安置屯田的情况。下面再研究凤翔地区。

凤翔府是蒙古军进攻金朝取道汉水流域首先攻占的据点，也是后方供应基地，以后又成为进攻四川南宋政权的要塞，关中的粮食、物资大部分由此通过，所以早在蒙哥汗三年（1253）就开始举办屯田。忽必烈即位后，屯田在不断加强，范围扩大到邻近数县。南宋灭亡以后，又放还至元十年所签接应成都的延安军人设立军屯，为户一千一百二十七。这支屯军，原来也属安西王忙哥剌管辖，编为屯户后归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到了清代，凤翔回民已发展到二十八坊，三万六千多口人；加上府属各县，共计三十六坊。可见凤翔县是回民的又一居住区。

凤翔县回民分布：

城内：沙家巷等，有二坊（两个清真寺）。

城北：麻家崖（今改称太平崖）、沙家庄（又作撒家庄）、乌家崖、崔家沟、米家沟、普沟（今称步沟，普步音近），大小沙凹、佐阳坡、同家沟、张家（又称张家磨）等。

城东：朱市巷、粉巷、麻巷、铁沟、陀（车）家门前、关村、寺院里、崔家洼、康家庄等。

城南：崔家凹、丁家河、海家河、铁家庄、小桑园、白家洼、崔家崖、石家河和梁家门前等。

城西乡没有回民“叛产”，也就是没有回民。

以上这些回民居住区，一部分在城内和城东南关，大部分在乡村。乡村的多在距城十五华里以内，少数达二十里。凤翔县有山、有原，回民分布区部分在山沟口，多数在平原接近水渠的地方。在这些地区，都具备着进行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也是适合屯田的地区。可以推测，当时凤翔屯田，就在这些地方，后来凤翔回民的形成，与元代屯田有很大关系。

不论京兆府和凤翔府，在忽必烈时期，所有屯田，绝大部分是军屯，实行军事编制，为军事需要服务，民屯较少。忽必烈临终前，才逐渐地改军屯为民屯。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兵部阅实安西、凤翔、延安三道军户，除元籍四千外，复得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枢密院欲以为兵，桑哥不可，帝从之。二十九年三月，延安、凤翔、京兆籍军三千人，桑哥皆罢为民，今复其军籍，屯田六盘①，这都是军屯，军屯户达三万七千多丁。次年，才逐渐将一部分军屯改为民屯。至元十年虽已颁发“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②的诏令，但陕西蒙古、诸色目人的屯户，仍隶军屯。军屯隶军事编制，屯户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宗教活动不能不受约束。

将大规模的军屯改为民屯，约在成宗以后。武宗夺取政权后，政治日益腐败，皇帝更替频繁，全国财政日益困难，灾荒不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军屯，已经不可能了。广大屯户在生活不能维持下去的情况下，陆续脱离军籍，“随地

①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入社，与编民等”，成了地方政权管辖下的户籍。

脱离军籍，归属地方行政，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自耕农户生产发展了，可以自由活动，集资修建宗教活动的寺院，从事宗教活动。大概在元顺帝至正年间，陕西出现一批清真寺，高陵清真寺仅仅是有记载的一个。穆斯林之间的相互联系频繁了，发展教徒已经有了可能。这样，原先诸色目人中的少数穆斯林和探马赤军中的穆斯林，就成了伊斯兰教的活动骨干，把一批信徒组织在伊斯兰教之中。从上引《万历武功录》所记的资料，直至万历十四年，关中各地，皆有回民，但人数很少，说明发展十分缓慢。

安西王忙哥剌时期，属下有一批穆斯林，但人数不多，宗教活动也受限制，所以伊斯兰教的势力很小。就是阿难答统治时期，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恐怕是呈倒退趋势。陕西地区的回民，主要是从元末明初开始发展起来，万历时形成的一种较大势力。

后　记

近时读[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书中译注了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的长篇著作《中国志》。志的第2章题目为《中国人的各种宗教》，说的是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时事，兹摘数段于后：

可汗（指皇帝，下同）令人于其宫殿中绘制了人类的最高领袖（穆罕默德）的画像。穆罕默德的画像完全以宝石镶嵌……

可汗令人为他本人在北京（汗八里）城外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他令人在该清真寺内与默加（麦加）相反方向的墙壁上用穆斯林文字和汉文方块字写下了《古兰经》中的几节经文和安拉最美的名字。为了进入该清真寺，其仪礼要求提前连续封斋数日。……当可汗驾幸清真寺前时，便舍弃了其全部銮驾，仍空着肚子下轿，免冠履地以前额触清真寺的门坎并乞求真主的恩惠。……

皇帝于是便起身，用汉语发表祝辞。他接着就入清真寺以重新参拜写有安拉最美名字的牌位，然后再静立于写有"《古兰经》各节"中神言的其它牌位前面，右脚置于左脚之上。他于是便开始洒泪并发出长叹！……

他说："啊！我的主啊！你知道和懂得一切。你以你的授命把该民族委托给了朕。今天由朕降旨处决罪犯。……。"可汗就以这种方式在清真寺内忏悔和自言自语地

独白，承认他的软弱无能及其苦衷，从早到晚不时地哭泣和呻吟……一直持续到天亮。……

该皇帝（成化，1465—1487）的某些所作所为也可以使人相信他秘密地遵循伊斯兰教规，但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宣传这一宗教，因为他害怕这样作会引起危及其帝国和平的某些骚乱。（第 157—160 页）

同书第 15 章《赴中国去的人员》中记述：

这是中国皇帝过去赏赐他们的情况。由于他现今已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他对他们的恩赐肯定要更多。

真主赐给了他信仰。……

据说，正德皇帝（1506—1521 年）刚刚信仰了伊斯兰教。……他在梦中梦见了先知们的真主挖去了其心脏并为他举行洗礼，然后又把它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并向他低声讲授教法，从而使他成为一名穆罕默德的信徒。他一觉醒来便发现了用绿色文字写在房间墙壁上的伊斯兰教信经。在出现这两种奇迹之后，他便向其宫中的人讲授伊斯兰教信经，其中有许多职务高低不同的人物都以他为榜样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据说，继这一事件之后，某些官吏和一批平民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一旦当皇帝受皈依之后，其无数的臣民肯定会步他的后尘。因为这些人习惯于像追随真主一样地追随皇帝，并且在一切方面都亦步亦趋。（第 315—317 页）

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写《中国志》这部书的时间有两说：一是 1516 年（明正德十一年），一是 1520—1521 年（明正德十五年至十六年），所取材料包括明武宗和他以前的

英宗(天顺)、宪宗(成化)和孝宗(弘治)几个皇帝时代,约60多年。当中对明武宗以前诸帝,或称可汗,或称皇帝,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否皈依伊斯兰教,何时皈依,但从行文上看,他们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明武宗皈依伊斯兰教,似乎是他亲自看见的事实,而且写得是那么具体、详细、真切。然而,这样重大的、改变中国文化传统的事,在明代官私文书、民间传说中却没有一点反映,这是不可理解的。这里我们只能相信明代的史书记载,不得不承认契达伊的道听途说、随意编造的故事纯属欺人之谈。

明代皇帝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来,虽然有种种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但对伊斯兰教还比较尊重,如敕修清真寺,允许伊斯兰教的传教活动,朝廷内外选用了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官员,伊斯兰文化科技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等,但作为统治思想,终明一代,一直,也只能是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而不是其他。不如此他们就无法维持其统治。明代儒家学说还在发展,以孔孟之道为中枢的封建统治思想还在加强,伊斯兰教也是在儒家学说言辞的掩饰下才允许传播的。

契达伊是一位布哈拉商人。据玛扎海里称:突厥人称其为塔吉克人,而蒙古人则称其为萨尔特人,萨尔特商人在全世界是著名的。据说他来中国不只一次。取名契达伊,或表示与契丹人有某种关系,或者意思是"中国通"。他的书有许多地方为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玛扎海里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缘故详加注释,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但是,书中有关中国皇帝、大臣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记载,著名学者玛扎海里根据他科学家的严谨素质并未赞许,尽管他与伊斯兰教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商人的特点是接触社会面广,听得多,

见得多，积之日久，张冠李戴，东编西抄，往往真假难分。因为从商人的习惯来说，真实、可靠、科学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诱惑视听，招来听众。契达伊在叙述这一问题时，加了许多“据说”、“可能”、“一旦”、“肯定”之类的词汇，使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玛扎海里的著作开始发行，必将吸引广大读者。著作中所收契达伊书中关于明朝皇帝、大臣信奉伊斯兰教的说法，可能被有的人当作证明明朝皇帝皈依伊斯兰教的证据，就象拉施德《史记》、《多桑蒙古史》一样，说元代安西王信伊斯兰教，使当今许多人信以为真。我们尊重伊斯兰教，研究和发扬伊斯兰教文化，赞扬穆斯林在中国、世界历史上的贡献，但必须把这一切建立在真实、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样才有说服力、生命力。否则，必将混淆视听，给历史学研究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讨论元代安西王未曾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我读到了契达伊《中国志》的上述记载，并不对本书论点发生动摇。反而，将拉施德和契达伊相比较，更加增加了我的论证：元代安西王和明朝几位皇帝皈依伊斯兰教的各种传言，全是无中生有。

王宗维

1993 年 11 月 18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元代安西王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作者=王宗维著
页数=135
SS号=10381507
出版日期=